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位于江岸区胜利街163～171号，依托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与其毗邻的唐生智公馆（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怡和洋行公寓（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三座历史建筑建立，占地面积257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471.39平方米。

1926年秋，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心，中共中央机关陆续由上海迁来，一大批著名早期领导人在武汉留下足迹。在那段特殊的日子，这幢普通的洋房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心脏”，党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和重大事情都在这里召开、决策。

2014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复同意筹建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这是全国唯一以“中共中央机关”命名的纪念馆。习近平总书记对筹建工作作出“修旧如旧，保留原貌，防止建设性破坏”的重要批示。2016年9月30日，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正式建成并免费对外开放，它的建成填补了中共党史的一项空白。馆内文物藏品2512件/套，年均接待观众量15万余人次。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以“中共中央在武汉”为切入点，通过复原陈列和基本陈列，再现1926年9月到1927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以及作出的一系列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重大决策，反映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

（图、文由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提供）

目 录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陈邂馨

顾 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心耀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陈 光 朱向梅
杨 华 李修文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 鹏 甘 琼 龙桃仙 吕照清
刘重武 陆建军 陈立新 郑学军
姚四平 曾艳红 谢受贵 窦 梅
潘红莲

主 编：陈国方

副 主 编：周 敏

本期责任编辑：张川蕾

编 辑：华 蕾 游 迎

封 面 设 计：王 鹏

红色印记

<<< <

4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筹建亲历记 / 赵晓琳

文化传承

<<< <

12 一甲子守护民间艺术的非遗传人

/ 朱汉生(口述) 胡 蝶(整理)

商聚汉皋

<<< <

16 勇立潮头方显创业担当 / 林文豹(口述) 郭国松(整理)

20 知难不畏难 勇于创事业 / 吴 刚(口述) 金高良(整理)

精工匠心

<<< <

24 我是通信战线上的一名战士

/ 潘圣宇(口述) 白爱萍(整理)

武汉文史资料

WUHAN CULTURAL & HISTORICAL DATA

CONTENTS

2021 年第 4 期 (总第 342 期)

山有黄门

<<< <

- 28 在珞珈山读书的日子 / 周 玲
32 华中工学院机械厂孵化记 / 周爱民(口述) 苏明华(整理)

委员天地

<<< <

- 36 援疆工作的片段回忆 / 周风华
40 我的委员作业 / 汤维钧

往事漫忆

<<< <

- 43 《光明日报》湖北记者站建站亲历记 / 肖志华
48 民族一家亲 温暖学子心
——东湖中学代理家长志愿服务活动回顾
/ 杨万军(口述) 刘中燕(整理)

都市史话

<<< <

- 53 老照片中的汉口英租界岗亭考析 / 胡全志
61 义品里及其周边历史建筑 / 王汗吾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达印刷厂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 82220667

(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 whzxwszl@163.com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筹建亲历记

◇ 赵晓琳

2016年9月30日，位于汉口胜利街的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举行开馆仪式，正式对外开放。这座全国唯一由习近平总书记批示建立、唯一以“中共中央机关”命名的革命纪念馆，为英雄武汉城市增添了一张靓丽的名片。这座纪念馆的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规划、设计、建设、文物等职能部门大力支持与积极配合，几代文化人付出了艰辛努力。我作为文博工作者参与全过程，对纪念馆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回顾建馆过程，往事历历在目，兹记之于后。

建馆缘起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正式筹建始于2012年，而我与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的关系可追溯到更早。

20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工作不久，参与的第一个科研课题就是“中共中央在武汉”。当时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党中央拨乱反正，加强对党的历史的研究，客观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武汉在1927年曾是大革命的中心，1926年年底至1927年夏，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往武汉后，一大批著名早期领导人在武汉留下足迹，但这段历史长期缺乏系统研究。为了真实记录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奋斗历史，1982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后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现为中共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给武汉下达了“中共中央在武汉”的课题，由武汉市文物管理处（简称文物处）和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简称党史办）合作承担，我作为文物处工作人员参与该课题。

当时我在资料室工作，在收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非常方便地查阅了所有相关的

档案文献、采访记录和资料，做了大量资料卡片。我参与了对健在老同志的采访和赴北京中央档案馆、中组部、公安部、民政部等部门查阅档案文献的工作；陪同1927年在汉工作的李强、宋侃夫等知情人实地寻找确定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现场作记录。经过两年多努力，我们掌握了中共中央在汉的基本情况，整理出“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在武汉资料汇编”和“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武汉的经过及其在汉情况”课题报告，研究成果上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5年，被誉为“大革命时期的中南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旧址被武汉市人民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由于近距离接触当事人及各种资料，这段特殊历史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记。此后，我辗转变动了几次工作单位，一直注意收集中共中央机关在汉资料，整理了中组部、中央军委在武汉等专题，其中《大革命高潮时期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发表于1987年的《武汉文博》，90年代为《武汉文物志》撰写了中共中央机关及相关旧址条目。这批中共中央重要活动的旧址成为武汉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外立面嵌立的文物保护标志逐渐让党在武汉的印记更加深入市民百姓心中。

1995年年底，我被调到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工作，这为我研究宣传中共中央机关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是同时期的党史遗址，人物事件密切相关，因此我在研究八七会议的同时进一步收集中共中央机关相关资料。因为两处旧址相距不过300米，所以我经常陪同来八七纪念馆参观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去查看中共中央机关旧址——那时还是普通市民住宅。1997年，根据研究考证结果，我绘制了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共中央机关在汉分布图”，首次在修改后的

八七纪念馆基本陈列中展出，其中标明党中央秘书厅及中组部、中宣部、军委、工委、农委等机构在汉的办公地（后来这幅图用于多处武汉同类纪念馆陈列中）。展出后，引起学界、专家和普通观众的关注，许多领导和专家学者都驻足仔细观看，询问中共中央在汉的具体情况。

1997年，为纪念八七会议70周年，我们去北京拜访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谈到中共中央机关在汉情况，他多次询问并表示要去实地看看。2000年前后，我和八七纪念馆的同事先后陪同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的领导和一些名人后代去过旧址。领导和专家学者们了解到中共中央在汉情况后，都提出要保护利用好这处红色资源（当时现状堪忧）。这逐渐引起省、市委陪同领导的高度重视。从那时起，我和八七纪念馆的同志们开始对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房屋情况进行调查，先后到武汉市公房处第二房管所（后属于武汉城投集团托管房）查阅房屋档案，复印当时13户居民的房屋面积、权属等资料，建立了档案。

2004年，党中央实行红色旅游工程，大力保护、开发利用各地红色资源，八七纪念馆被列为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属于重点建设项目。中宣部、全国红色旅游协调工作小组办公室、国家发改委、国家文物局等部门多次来考察，全国各主要媒体不断报道八七会议及其纪念馆。与此同时，他们进一步提出要加强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保护利用问题。武汉市委、市政府在规划八七纪念馆的同时，着重考虑如何保护利用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我多次参与并现场介绍情况。

2005年4月27日，时任市委副书记殷增涛陪同专程来汉考察红色遗址的中宣部

原副部长龚育之、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视察八七会址、德林公寓、中共中央机关、鲍罗廷公馆等9处红色遗址，省、市委办公厅，省、市委党史办，市文化局领导刘克毅、袁希民、易福才、唐惠虎等陪同视察。八七纪念馆负责拍照、录音等接待工作，我逐一介绍各旧址。石仲泉副主任有一句名言：“走党史”，那天就是重走1927年党的历史。他对每一处旧址都很感兴趣，特别是在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前听了介绍，又向我询问了一些情况后，对在场领导高度肯定了中共中央机关的重要意义，连续三次说：“这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南海，非常重要，要好好保护和利用这一旧址。”2010年、2015年，石仲泉又先后两次视察该旧址。

4月28日，殷增涛副书记在市委201会议室召开红色旅游工作会议，时任市委宣传部长车延高、副市长刘顺妮、文化局局长唐惠虎及计委（发改委）、规划、旅游等部门领导参加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的保护利用与八七纪念馆的扩馆“捆绑”“打包”在一起，纳入红色旅游项目，统筹规划建设。会后，八七纪念馆按照文化局的安排，再次调查摸底房屋和住户情况，我开始思考如何在此建立纪念馆。

2007年11月30日，来汉出席中共五大纪念馆开馆仪式的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景田、副主任李忠杰、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向省委书记俞正声、市委书记苗圩提出建议，可以考虑建设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因其他中共中央驻地——上海、瑞金、延安、西柏坡均已建成大型纪念馆。当日下午，李景田、李忠杰在省、市党研室，省、市文化、文物局领导的陪同下视察八七纪念馆和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我为他们作情况介绍。此后，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会议，要

求发改委、规划局、文化局等部门开展前期论证，各种筹划、商议、论证会议达二三十次之多。

2013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八七纪念馆经常派人去查看旧址，观察了解其变化。有一段时间，因单位无食堂，我的午餐就在中共中央机关旧址隔壁怡和洋行公寓门口的摊子上解决，顺便看看旧址情况。我们发现旧址的住户比以前有所增加，紧邻门口东边的一家房屋中介变成彩票销售点，西边的杂货铺变成了一个炒货摊。加强保护迫在眉睫。

正式启动

2010年1月22日，习近平视察武昌农讲所旧址和毛泽东旧居，省、市委领导罗清泉、王国生、杨松、阮成发等陪同视察。那时我已调到武汉革命博物馆主持工作，全程参与接待。之后两年，从中央到省、市各级政府不断推进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建馆工作。也许是比较了解前期情况，建馆仍然是我的工作任务之一，我多次参与市委、市政府的汇报会、协调会，提出建馆需求和建议，与到会者共同商议如何建馆。

2012年是建馆启动的关键年份。2月，市领导准备在全国两会期间向党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汇报建馆情况。我承担了汇报材料中编写建馆方案和展陈计划的重要任务。建馆方案就是建馆规划。根据博物馆学基本理论、按照纪念馆功能需求、结合实际情况，我梳理前期的思考，于2月20日完成《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建馆方案（建议稿）》，提出初步方案：1.征收汉口胜利街165、167、169号（即中共中央机关旧址），

腾退住户，在此恢复1927年党中央办公的历史原貌。2. 征用（后改为租用）胜利街163号（原唐生智公馆，现凯威啤酒屋，产权属于62101部队）用作纪念馆辅助展厅，在此举办基本陈列。3. 征用胜利街171号（原怡和洋行公寓），腾退住户，作为临时展厅和办公区。建馆方案同时提出了建馆规模、功能分区、投资概算、预期效果等。这是最初的建馆方案。

与此同时，我加班完成了《中共中央在武汉》陈列提纲。因时间太紧，已调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唐惠虎再三要求必须在唐良智市长赴京参会之前拿出来，我只能根据当时已有的资料拟出一份急就章，简要说明纪念馆将举办陈列的主要内容。当时仅用一周时间完成两份材料，全靠以往的积累了。随后，文化局召开专题会议，完善优化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形成汇报稿，呈报市政府。

2012年2月23日，武汉市政府正式决定：建议（因最后审批权在党中央，故为“建议”）建立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批准市文化局呈报的建馆方案；将此项目纳入武汉历史文化风貌街区保护利用（简称风貌区保护）工作范围，正式启动。风貌区保护是市政府当时的一项重大工程，为此还成立了风貌区保护专家委员会，我是成员之一。时任市委书记阮成发、市长唐良智在文件上签字批示同意。市政府专题会议对建馆工作进行分工，明确了职责：江岸区负责腾退居民，市文化局负责建馆，市党史办负责史实把关。副市长刘英姿、党史办主任易福才、副秘书长唐惠虎等均签了落实意见。3月初，唐良智市长带队在两会期间拜会了中央党研室、国家文物局等单位的领导，建馆得到充分肯定和认可。

2012年年底，我到退休年龄。时任文化局党委书记和晓曦、副局长马勋标跟我谈话。和晓曦说：“你虽然退休了，但是还要发挥余热，继续做工作。筹建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是市里给文化局的一项重要任务，局党委决定，你以后专做此项工作，直到纪念馆建成。”由此，我的退休生活开始了新的一页。

没有了繁杂的行政工作，我可以专心投入建馆了。2013年年初，市文化局成立了由书记和晓曦、局长陈邈馨牵头的筹建领导小组。我拟定了筹建工作计划，提出人员、经费等要求。陈局长逐一批准，他明确表态：需要什么只管提出来！很快，从武汉博物馆、辛亥革命博物馆、晴川阁管理处、中山舰博物馆、八七纪念馆抽调人员，另招聘了几个临时工作人员（后期又正式招考了四个带编制的研究生、武汉少儿图书馆袁钢书记作为领导加入），加上我和同属武汉革命博物馆退休的王谦共十儿人，组成了筹建工作专班。文化局拨付了前期工作经费，安排了工作用车，办公地暂设在中共五大会址（后移至八七纪念馆），筹建工作走上正轨。此后的四年，我和筹建团队开始了辛苦的实质性工作。

攻坚克难

建馆的前提是将用于纪念馆的三组建筑内的现有单位和住户迁走。江岸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大力支持，执行力非常强，投入4300万元经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三个月之内顺利腾退安置了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和怡和洋行公寓的居民共51户，搬走的居民给予了积极配合，没有产生纠纷和“后遗症”。唐生智公馆的产权属

于62101部队，唐惠虎副秘书长多次带领文化局文保处的郝刚以、张颂明等登门协商，争取支持，最后确定采用租用方式，由武汉市政府与部队签订协议。江岸区为配合纪念馆建设还对周边环境进行整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为建馆打下基础。

我所承担的建馆工作分两大块内容，一是项目建设，一是陈列及复原。有人说我是总体策划，其实主要是有上级的正确领导，有个好的筹建团队，有各方面的配合协作，我只是做了文博人应该做的事情。

1. 项目建设方面，参与决策，做好配合。因为这个纪念馆依托旧址而建，馆舍是三组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不同于新建博物馆和纪念馆，在项目立项、报批程序、经费来源等方面有诸多特殊性，非常复杂。筹建期间，市文化局上下通力合作，博物馆处、文保处和计财处的孙颖、郝刚以、张颂明、万勇、向皓等诸同志付出许多努力。我参与了建馆所有事项的研究决策，因是文博

人，对文物工作相对熟悉，领导信任我，大家尊重我。纪念馆的建设基本上是按照我的策划付诸实施；在疑难复杂问题上，群策群力，我的合理意见被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接受采纳，如观众流线、增设电梯等。先后起草代拟了一揽子向国家文物局、武汉市发改委等部门的请示、报告、汇报材料；配合协调武汉城投代建公司、武汉工程设计公司、湖北省文物局古建筑保护中心、武汉民用建筑设计院等单位完成了前期勘测、可行性研究、建馆立项、文物维修勘察设计与施工、安（消）防设计与施工等十余个方案。2013年8月29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一行在省文物局领导沈海宁、王凤竹的陪同下视察纪念馆建设，童明康提出要求：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是国保单位，归国家文物局管，建纪念馆中共中央办公厅征求文物部门意见，我们大力支持，可以给予维修、安防、消防的经费。他还说：“这（指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比六大会址重要，要搞好！”（当时国家文物局正按照党中央要求在莫斯科郊外筹建中共六大会址纪念馆）2013年至2015年，国家文物局以最快速度审批了我们所报的各项方案。

做好报批的申请工作。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相关规定，国家对筹建纪念馆采取从严控制的原则，须履行严格的报批手续，



2014年11月，赵晓琳（右三）向国家监察部领导汇报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建馆工作情况

因此筹建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须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为了准备好上报材料，我带领筹建专班，完善细化建馆方案，绘制出效果图，制作汇报光碟。同时，我和王谦编写完成《中共中央在武汉》陈列大纲，经省、市专家论证后，省、市党史研究室很快审核通过。当时全国已在瑞金、延安等多处建有纪念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的场馆，党中央对同一类纪念馆从严审批。为了说明武汉建馆的必要性，确保批准，我在向中共中央办公厅请示的代拟稿中特意强调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是全国唯一以“中共中央机关”命名的革命纪念馆。我认为这句话很重要，强调了其特殊性，得到文化局的一致赞同。之后，《关于建立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的请示》文件和两个附件《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建馆方案》和《中共中央在武汉》陈列大纲，经文化局组织论证、把关、审核后上报武汉市委、市政府。2013年9月，由中共湖北省委上报中共中央办公厅。

按照市政府的决定，在向党中央报审过程中，各项筹建工作依法依规继续进行。

2. 在申报建馆的同时，我们的业务工作重点围绕举办辅助陈列和原状陈列开展。主要有三项具体任务：

第一项是征集文物资料，这是研究和建馆的基础。2013年年初我拟定了征集计划，先后带队赴北京、上海、南京、广州、长沙、安庆等地，从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书店征集到一批当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汉口开会的会议记录（这批文献与旧址有直接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国民党中央档案数十份；从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复制一级、二级、三级文物100余件，1927年前后出版的报刊原件1300余份；拜访当年中共中央机关

工作人员的后代——任作民的女儿任华明及孙子任正义、陈独秀秘书黄玠然的儿子黄道宏、宋侃夫的儿子宋晓狄等二十余人次，他们不仅提供资料，还捐献有关实物——箱子、印章、照片、档案等。我们的征集公告发出后，武汉地区一批红色藏家积极踊跃向筹建专班提供实物，特别是证章藏家余小林把自己多年收藏的一批与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相关的绝版证章都拿来了，希望这些证章在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展出，回归到曾经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我们用两年多时间，从境外征购回来一辆中共中央机关使用的、1925年生产的同款小汽车。陈邈馨、马勋标等文化局领导多次听取汇报，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陈局长多次表态：尽量多征集实物资料，不要因经费而错过机会。陈局长的支持为我们征集文物提供了坚强后盾，才使得纪念馆开馆时有那么多实物与观众见面而非只有图片，至今我仍然十分感谢陈局长的信任（陈局长后来任分管文化工作的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筹建过程中，我们先后组织召开六七次文物专家鉴定会，共征集到各类实物文献等约3000件（套），为研究和陈列打下坚实基础，许多实物在基本陈列中首次面世，讲述着历史故事，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第二项是编写恢复旧址原貌的方案，这是建馆方案的具体化，是我的一项艰巨工作。旧址位于原俄租界四民街61号，是两栋20世纪初建造的中西结合式住宅。为确保恢复旧址原貌的真实性，我查阅了所能看到的回忆与纪念文章和档案文献，经过反复考证，掌握了中共中央在此办公的机构、人员、办公室分布等情况；又查阅了1927年以前的《良友画报》《图画时报》《益世报》等十余种历史报刊和画册，反复考证研究，

明确了恢复原貌的四项原则，编写了《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原状陈列方案》，即在主楼恢复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室，中央秘书厅会客室，文书、发行、财务、警卫等办公室和陈独秀、蔡和森等领导人及王若飞、陈乔年等人的办公室兼卧室；在副楼恢复中央图书馆、档案室等原貌；在过道里陈列中共中央机关使用过的同款小汽车，两栋楼共计复原30个房间；确定了每个房间的布局及陈设，各类陈设品近千件。2013年年底，《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原状陈列方案》经省、市党史和文博专家会评审通过。到会的陈芳国、李崑、周斌、万全文、刘庆平等给予充分肯定。他们认为这个方案是以大量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成果，定位准确、依据可靠、科学严谨、符合历史。周斌说，武汉文博系统的建馆历史上第一次复原这么多房间，考证得这么细致。专家们对一些细节和个别人物也提出了意见。我修改、完善后形成定稿。

第三项重要工作是编写基本陈列大纲并转化为布展方案，由我和王谦共同承担。在最初简单提纲的基础上，我们以1926年9月至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在武汉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为主线，着重反映党在大革命由高潮到遭受重大挫折时，对中国革命道路艰辛探索的历史。紧紧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历史功绩及其历史意义开展研究，用珍贵的历史照片、实物、文献、档案，展示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历史记忆。

“中共中央在武汉”是新课题，许多问题缺乏研究，没有定论，我们边查资料边研究，以前的积累此时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厘清线索、得到答案，经常向专家请教并与之探讨，吸收已有成果，适时召开专家论证会。2013年5月，终于完成了大纲的编写。《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原

状陈列方案》《中共中央在武汉》辅助陈列大纲先后获得省、市党史、文博、地方志专家会的论证通过。

按照相关规定，陈列大纲需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批才能报中共中央办公厅。唐惠虎副秘书长带领党史办、文化局和筹建专班一行5人赴北京汇报。2013年6月7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专家评审会，李忠杰主任主持。参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共中央在武汉》辅助陈列大纲结构合理、脉络清晰，陈列主题概括准确、科学，内容系统完整，定位恰当、与时俱进，体现了党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经评审予以通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批复，为建立纪念馆和举办陈列展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接下来，我们依据大纲开始编写具体陈列方案，经过无数的海选资料和研究考证，把研究成果转化成一段段文字、一张张照片、一幅幅图表、一件件艺术品，力求用最新发掘的实物、文献、档案再现那段峥嵘岁月。这个过程同样艰辛，用了很长时间。如：为了一张“中央领导来汉时间表”，我们要花十几天甚至更长时间考证；为了一幅八九十年前历史地图的准确性，需要用放大镜去反复核对，等等。陈列中每一幅图表都是研究考证的结果，每一件展品都经反复挑选确定，每一个展项都经过字斟句酌。筹建期间，我们加班是常态，节假日也在赶时间。那时没有辛苦的感觉，只是想努力地尽可能做得更好。我还把以前认识的红色后代和研究者都再联系起来，为征集文物资料和研究发挥作用。为了保证复原陈列的历史真实感、低调不奢侈，我们多方寻找线索，采用民国时期的老家具、老物件恢复历史的原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共中央在武汉”是一项综合研究成果，是一本厚重的书，一

本用博物馆语言表达的中共中央在武汉的书籍，填补了党史上的空白。

习总书记批示的鼓励

习总书记对筹建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作批示是建馆之特别大事。2014年1月9日，我们筹建专班得到上级部门的重要消息：1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北省委报送的关于拟筹建“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的请示作出批示，内容是：“修旧如旧，保留原貌，防止建设性破坏。”同时获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同意武汉市筹建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两办批复在“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前加了“武汉”二字。新年伊始，全体筹建人员因这一好消息而备受鼓舞。没想到不仅建馆方案获得批准，而且总书记对建馆作出具体批示，这在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兴建史上尚属首次。很快，时任省委书记李鸿忠、省长王国生、市委书记阮成发、市长唐良智等领导相继作出批示，要求落实习总书记的批示精神，建好纪念馆。2014年1月15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专程来汉视察建馆情况，要求按照总书记的批示修好旧址，建好纪念馆，当场表示：国家文物局在维修方案、资金等方面将全力给予支持。唐市长等多位领导先后来现场办公，解决实际问题。

筹建团队增强了建馆信心，筹建工作加快了步伐。6月，国家文物局很快拨付了修缮和保护旧址资金1200万元。之后各项前期工作逐步到位，立项、招标等程序相继完成，施工单位陆续进场。2015年，基本陈列和原状陈列进入实施阶段。

建馆工程按照总书记的批示精神，完

成了三组建筑的维修、改造，做到原材料原工艺，修旧如旧，最大限度保留了历史原貌，克服了诸多困难，解决了旧址过道、消防水池、安全通道等问题。我们与中标展陈公司密切配合，用三四个月时间细化、指导形式设计，优化流线，确定重点，明确亮点；在现场布展施工阶段，经过无数的交流与磨合，逐一将我们的陈列方案落实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展览，个中繁复难以言表，但苦中有乐。2016年9月，陈列布展终于完工。开馆之前，阮成发书记、宣传部部长李述永是首批观众，他们从头到尾仔细参观，我为他们讲解。阮书记对纪念馆的建成给予充分肯定，说这应该是一份合格的答卷，可以向习总书记汇报了。在场的人都开心地笑了，我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2016年9月30日上午，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正式开馆了。经过无数人的努力，今天她终于敞开胸怀接纳观众，用近千件实物、图片、文献等展品，讲述9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在武汉领导革命斗争的辉煌历史，再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在江城的奋斗足迹。从此武汉多了一张红色名片，多了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如今，我对纪念馆的一切仍然感到非常亲切。我熟悉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我了解她的前世今生，我知道每一件展品背后的故事。这座纪念馆见证、记录和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艰辛奋斗历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上重要的篇章。我能为之尽绵薄之力实为幸事！

（赵晓琳：武汉革命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

一甲子守护民间艺术的非遗传人

◇ 朱汉生（口述） 胡 蝶（整理）

鲜艳的宝塔顶，船头“梢公”撑篙引船，船上坐一“仙姑”，船尾“摆梢婆子”手握破芭蕉扇随船而行，还配有敲锣打鼓、拉琴，唱词即兴创作。采莲船作为湖北传统民俗舞蹈形式深受百姓喜爱，2007年入选武汉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武汉江夏金口，一支“武汉采莲船”的民间非遗民俗表演艺术团队，将这一颇具地方特色的表演形式，送到金口每个村庄和校园，丰富了江夏百姓的文化生活，也担起了艺术传承的重任。

学徒工巧遇汉剧大师，练就一副好嗓子

我从小便与采莲船结缘。1957年的冬天，十几岁的我到金口箴业社当学徒，学习

箴匠手艺。刚开始当学徒时，师傅要求很严格，每天收完工，必须打扫清洁，那些没烧完的柴火都要倒出去。每次倒完柴火，都有一个老人在那里捡柴火，时间久了，我就跟老人熟了起来，有空的时候还会去老人家里喝茶聊天，老人常常会在家拉胡琴、唱戏，我在一旁听得很着迷，后来才知道这位老人竟是金口鼎鼎有名的汉剧大师胡宝山先生。

从此以后，只要有空，我就会去听戏，有时候还跟着胡宝山老人后面哼几句。胡宝山老人发现我的嗓子特别好，很适合唱戏，便问我：“喜欢唱戏吗？喜欢的话，我可以教教你。”我喜出望外，赶紧拜师。从那以后，我每天收工就去胡宝山老人家里学戏。老人告诉我，戏剧艺术是我国文化艺术宝库中一种独特的表演方式，深受人民群众的喜欢。

然后要求我从基础学起：练嗓子、练招式、识戏谱……基本功要一点一点过关。

我每天回家以后，对着镜子独自练习，日复一日，我的戏越唱越有味道，同时我还掌握了一门随机应变唱曲的绝活。

篾匠小学徒出师，练就扎莲船好功夫

采莲船的制作需要纯手工，竹木制作成骨架，扎成船型，船身则用彩色绸布包裹起来，并配有流苏花边进行装饰，楼阁式船篷扎在船顶，船头托起两盘莲花，船顶上盖有绸布并缀以大红绣球。作为制作工艺的第一步，光是劈篾这一项就难倒了很多。

而在学篾匠的过程中，为了把手艺练到家，我不光又快又好地把自己手里的活干完，还总是免费帮邻里劈篾编篓。每逢年节，乡里乡亲不少人找我劈篾，用来做纸糊的各种玩具，逗孩子们开心。遇到不会做的玩具，我就去请教会剪各种花样的师傅李顺保先生。制作过程中，我发现，编织东西并不难，难的是劈篾。为了把握好劈篾的尺寸，我认真仔细地对待每一次劈篾的活儿，通过一段时间苦练，手艺越来越好。

武汉采莲船的长度基本上是2.08米，民间风俗带“8”寓意发；宽44厘米，寓意

事事如意、四世同堂，这个尺寸也刚好能够容纳下一个人。每年春节，村里扎莲船的任务总少不了我。上山寻找楠竹，将竹劈成60多根宽窄不一的竹篾，编织成两层共8个角的采莲船，再用农家特制的彩布为采莲船进行装饰，方得“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中，一茎孤引绿，双影共分红”的效果。经我的手扎制的莲船，又牢固又漂亮，坐船的姑娘随着音乐在撑篙大汉的竹竿牵引下翩翩起舞，边唱边舞，把舵的艄婆与两位主角配合耍滑稽动作，引得村里老少开怀大笑，大家在“采莲船”的喜庆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祥和之年。

我也声名远播。此后，如遇政府、文化部门组织的大型文化活动，我都会受邀参加。我不仅编排节目，还亲自动手、利用自己学习劈篾扎糊的手艺，制造出各种表演道具，为活动的圆满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朱汉生现场展示劈篾手艺

组建手工业宣传队，扛起非遗传承大旗

1963年，我成立了手工业宣传队，编排短小的文艺节目，如《中秋之夜》《路遇》，利用业余时间到各联社演出，受到一致好评。之后，我又开始编排大型汉剧，《红灯记》《沙家浜》被武昌县文化局调往咸宁地区汇演，荣获优秀表演奖。

我致力于挖掘金口和汉派传统文化节目，几十年来，无论身处什么岗位，我都牵挂着汉派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扬。2007年4月开始，我又组建了一支凤凰文艺队，刚开始没有资金，没有场地，就个人带头集资，借用金口老建筑的破旧房屋进行修理，用于排练。以“威风锣鼓”为主开始自编、自导、自演。同年5月份在武汉江滩参加“石油杯”展示，被评为优秀健身队光荣团队。同年9月份正式纳入花园社区文体队，开始招收有业余文艺爱好的人，逐渐扩大了队伍，成为一支有组织、有实力的文艺队伍。

金口的民俗“采莲船”是我重点编排研究的项目，运用现代手法多次改进编排，在江夏区百花奖比赛中荣获一等奖，同时申报武汉市非遗成功，我也成为“采莲船”的传承人。

《蚌壳精》
《龙虾闹年》都

是金口民俗的精品，2015年，在区文化局、金口街办事处、金口文化站及花园社区的大力支持下，我的团队正式成为武汉非遗民俗艺术表演团。“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会唱下去跳下去，把我们金口民间文化传承下去。”我除了要指导五六十人的非遗艺术表演团排练、创作，每年下乡、进校园演出活动达120场，最密集的时候一天就有两三场，最远还到过澳门演出。从一个小学徒慢慢成长为一位民间艺人，我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金口非遗文化资料的收集工作中，传承千年古镇民间文化。

组建团队带徒弟，“冷”项目带出“热”效应

我对各种民俗痴爱，不断潜心钻研，“草把龙灯”就是近年的创意。创意何来？记得小时候有一首儿歌“草把子龙灯年年有，玩灯的小伙子不怕丑”，讲的就是穷人家的孩



2019年，朱汉生（右）在金口街义贞小学进行采莲船民俗表演

子没有钱做龙灯，就用稻草把子做龙灯玩。

“现在大家见多了纸糊的、塑料的龙灯，倒是草把子龙灯没见过了。”

为了解草把龙，我步行专访很多老同志，这个草把子龙灯到底有多少年历史，是怎么来的？有人说，三国时期，诸葛亮草船借箭，利用稻草做的草船借到10万只箭。如今用稻草做龙灯，也是让人们开阔眼界，更加接地气，运用现代手法，通过构思设计音乐，将用稻草制作龙灯的过程展现出来，复古创新让人们感到新鲜。

草把龙从头到尾有9大节，每大节里有6小节，里面全部是用钢丝编织的套圈，可伸缩。外面用金灿灿的稻草编织包裹，缩在一起就像一捆稻草，打开就是6节龙身，9大节连在一起就是一条长龙。为了做草把子龙灯，我和队员们还专门去农村收集草把子。现在多是脱粒机脱粒，草把子短的不能用，我们找了很久，才找到手工割稻的农家。拖了一车草把，晾干、编织、造型……光做龙，就用了大半年时间。

在我和队员们的共同努力下，非遗艺术表演团编排的《草把龙》《采莲船》等传统曲目，成功申报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蚌壳精》《龙虾闹年》成为江夏民俗的精品。这支民间艺术团在丰富居民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也传承和发扬了优秀的民俗文化。

改进表演创新形式，非遗亮相军运会

为了让传统艺术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我也在传统的基础上作了很多改进。原来划采莲船的都是男性，现在男女都可以。原来一条船一组人上阵，现在可7组人马同时表演。为了达到更好的声音效果，会提前录音、

配音。而在内容的编排上，也融入了更多时代元素和社会主流声音。为了让孩子们接触这项艺术，我们还制作了适合小朋友操作的微缩版采莲船。

为了将草把龙更好地融入群众，两条龙还配了8个道具，翻腾的龙身与彩灯福鱼一同表演，传递着人寿年丰的祝愿。《草把龙》表演在喜庆日子里很受群众欢迎，几十捆稻草排成一个“丰”字型，非常壮观。《草把龙》入选2019年武汉军运会开幕式暖场节目，作为编排者，我重组队伍，手把手亲自传授，以最好的状态在军运会展示汉派非遗魅力。

尽管已到耄耋之年，我每天行程仍然安排得满满的。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坚持到底，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这门传统艺术。

（朱汉生：武汉采莲船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蝶：江夏区文化馆非遗部主任）

勇立潮头方显创业担当

◇ 林文豹（口述） 郭国松（整理）

我是福建莆田东埔镇人，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小时候跟随父亲到晋江，边上学边学做蒸笼。

回想当年，年少的我肩挑手扛一屉屉的蒸笼担子，开启了我人生艰难的创业时刻。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代，我从竹制品批发，之后跨行到建材生意，再到和兄弟们一起在武汉打造集展示、仓储、物流、办公、酒店为一体的华中地区建材枢纽中心。吹着江风，我感受着江城武汉的魅力与传奇，无数次回味着我与这座城市之间的故事……

由一屉屉蒸笼拼出自己的创业人生

回忆起当年第一次出远门，我至今难忘。1982年，18岁的我跟着哥哥走出家门北上河南开始做蒸笼生意。我们挑着蒸笼担子“哐当哐当”地从家乡东埔坐车到莆田市区，再前往福州，然后辗转南昌、九江，再坐轮船前往武汉。为了省些钱，到了武汉后我们步行到汉口，又奔波四五天，终于到达

落脚点河南信阳。那是我和武汉的第一次接触，感觉这个城市挺好的，当时心里默想着有一天能到武汉做生意。

1984年，听老乡说黑龙江的大企业多，蒸笼生意效益好，我便立即前往黑龙江。有一次，我到当地基层食堂寻找业务，看到一辆农场接站车，我不假思索地就上车了，不料碰到下雨，黑土路面泥泞不堪，车辆不能再继续行驶，我只好在农场旅馆里住了三四天，把仅有的钱都花光了。身处异地他乡，举目无亲，幸运的是，最终我顺利地接到了给农场做蒸笼的业务，农场司务长还把我的食宿费都给免了。东北农场的蒸笼一般一副六七节，揽下二三十副蒸笼的生意，几个人需要做一个左右的时间。忙碌到手指头都变形了，竹刀还经常会划伤手，但是只要有业务做，这些伤对我来说都可以忽略不计。但就算如此辛苦，一年下来能赚到千把块钱就算是很好了。

渐渐地，我发现市场上蒸笼生意日益饱和，便开始摸索着做起了竹架板、毛竹批发

等生意，因为需要与工程公司打交道，我的业务便逐步转向了建材方面。1989年，我开始转行做陶瓷等建材生意；1994 ~ 1995年，我在吉林长春周边做起了陶瓷批发；经过几次市场考察后，1996年，我带着自家兄弟来到武汉做陶瓷生意，并在这里扎下了根。

那时，武汉的建材市场有点乱，遭到欺负是常有的事。但那会儿的我年轻气盛，胆子也大，一心只想在武汉站稳脚跟，再大的困难都难不倒我。经过几年的业务拓展，我的生意越做越大：门面从百平方米发展到几千平方米，从一个店面增加到多个店面，从批发普通瓷砖到代理大牌瓷砖，从个体户发展成正规公司，从一个业态发展到多个业态。功夫不负有心人，20多年来，我和老乡一步步把汉西铁路货场发展成了规模较大的瓷砖批发集散地，大家在周边楼盘集体买房定居，情感在一起，生意在一起，生活也在一起。如今在此扎堆的莆商经营商户还有500多户，加上家属有五六千人。回忆过往，我感慨万千、百感交集，艰辛创业的一幕幕总是让我难以忘怀，我对这个地方注入了太多情感，我骨子里已经深深地融入了这片土地，父亲在世时，我每年都要接上父母到这里和自己住上一阵。

伴随武汉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不断变化，我意识到必须再次转型。2010年，我与兄弟商量后，决定成立湖北星光万顺投资有限公司，通过蔡甸区的招商引资计划，在毗邻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星光村投资建设星光国际建材城。这是一家以陶瓷、石材、板材为主要经营对象，集展示、仓储、物流、办公为一体的专业建材批发市场，占地上千亩，意在打造成为华中地区的建材枢纽中心。我想再造一处乡亲创业、就业基地，并一直以极低的租金支持建材商户发展，较

好地带动了周边居民就业。在我看来，武汉的发展变化很大、机会很多，自己要尽力把更多的优秀闽商引到武汉来看看、来投资。

把商会打造成5万名在汉莆商温暖的家

2010年，武汉市莆田商会成立，大家推举我任第一届执行会长。2011年商会党委设立后，我认为作为企业家，必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于是率先向党组织申请入党。2015年，我被选为商会第二届会长。我们商会会员多、分布广、组织比较松散，对于我这个草根会长来讲，无疑是很大的挑战。有人劝我，办商会吃亏且不讨好，不要太认真。但我认为，如果没有把商会认真办好，就是会长的严重失职，也是身为共产党员的严重不作为。

武汉市莆田商会是湖北省唯一一个莆商商会，也是武汉市社会组织5A等级和全国“四好”商会评定方面的“双冠王”，商会党建还被全国工商联列为“全国商会党建典型案例”，中组部曾三次调研商会党建工作，堪称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一面旗帜。目前，商会有会员代表505名，党员135名，商户1万多家，基层行业（片区）支部8个，涉及建材产业、食品产业、珠宝产业、红木产业、能源产业、大健康产业等30多个行业，累计在汉投资过千亿元。2020年9月，我原本想交班，但大家依然推举我连任第三届会长，很多会员鼓励我：“大家都喜欢商会，商会需要您，需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为5万名在汉莆商打造最温暖的大家庭。”如今，商会触角已经延伸到省内各地区，湖北莆商联络办公室成了联络、汇聚在鄂各行各业10万名莆商的桥头堡。有时候，我感觉压力挺大的，甚至焦头烂额。但在其位，

必须谋其政，我不能对不起大家对我、对商会的期望，必须克难攻坚，在最后五年任期内把商会带到一个新高度，打造出可传承、高质量的“三个升级版”商会。通过抓党建、建机制、树文化、促发展、提规范“五位一体化”建设，夯实基础、强化服务、提升创效、壮大品牌，全面提升政治站位，在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上实现新突破，打造“党建升级版”；全面提升系统治理，在商会可持续实践创新上实现新突破，打造“治理升级版”；全面提升服务赋能，在行业振兴与企业成长创新上实现新突破，打造“发展升级版”。虽然我的会长任期有限，但我将为此奋斗，为乡亲服务、为社会分忧是没有期限的。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许多莆商企业出现关停潮。当时，我自己的企业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想着大家的难处我十分焦虑，每个企业背后都有一家人，如果长期没有收入改善，就会是一个大问题。为此，我带领商会领导走访会员、开会研究，争分夺秒帮助会员企业复工复产。



林文豹会长（右五）率队深入企业走访看望商会会员

2020年5月，我拍板免去了全体会员今后5年的会费，总额约500万元。商会挑战“零会费”，这是从未有过的，但是商会的难比不上大家的难，只有大家挺过去了，商会才会更好。后来换届会议需要经费时，我和其他商会领导带头自掏腰包解决，不给会员增加一丁点负担，全力帮助会员企业复工复产渡过难关和疫后振兴发展。

不当家不知道当家的难。莆商大多白手起家，靠勤劳吃苦一点点打拼事业，我深知他们创业的不易。因此，我每年都会抽出很多时间来到会员中间，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困难，每年商会至少能为会员解决上百件问题，大家也喜欢亲切地喊我“阿豹”，我也听惯了“有问题找阿豹”的乡音。会长职务是一份荣誉，但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要求会员做到的，我自己首先带头做到；对会员有利的事，我首先让给会员；对商会不利的，我坚决不容忍；对党和政府不利的，我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我在店面腾出场地给商会片区支部使用，我带头挂上“党员示范

户”标识，公示自己的手机号码欢迎客户监督……这些年，有些人想利用商会谋私利，我始终不接受，因为商会是所有会员的，维护好这个“大家庭”，即使因此得罪了一些人，我认为也是值得的。现在，商会会员队伍不断壮大，商会口碑、社会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力都今非昔比，过亿资产会员企业从10多家发展到了100多家。欣慰的同时，我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爱心无大小，企业家的爱绝不能缺席

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社会是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作为会长，我对此深有体会，我在商会各种场合中反复对会员强调：“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爱心无大小，爱不能缺席。”“优秀企业家一定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2010年商会刚成立不久，我提议成立“妈祖之光”志愿服务总队，并亲自担任队长，带领会员主动履行社会责任。这些年来，不论是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还是防汛抗灾、精准扶贫，或是扶危济困、社区共建，都有我们商会活跃的身影，我们已经带动会员累计捐款捐物达数千万元，充分体现了致富思源、回报社会的企业家胸怀。

疫情无情，莆商有情。2020年春节，一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阻击战在全国打响。关键时刻，疫情就是命令，商会就是会员的主心骨、定盘星。当时我已经回到家乡陪母亲过年，却时刻牵挂着武汉的乡亲们。我在家乡全程“遥控”指挥，第一时间成立了领导小组，第一时间向防疫指挥部捐款，第一时间成立了抗疫突击队。早早发出“9点倡议”，引导党员、会员和乡亲积极响应号召留守武汉，引导几万名回莆人员服从管理、自觉隔离。之后，我们商会一直没有停下支援抗疫的脚步：为火神山医院建设单位捐赠安全防护物资，为2个街道和4个社区提供防疫消毒物资，为1家福利院供应米、油等生活物资，为2家救治医院捐赠点心、食品和护士鞋，为一线警察提供防护物资，为莆田援汉

医疗队提供各种急需物资，为多位异地爱心莆商支援武汉抗疫提供特别协助……特别是从2月13日起，我们商会为两支福建援汉医疗队共277人提供了长达48天的全天候驻点保障“保姆式”服务，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了贡献。夏季汛情告急时，商会的“决战疫情突击队”快速转变成“防汛抢险（预备）突击队”，组织党员、会员开展巡堤演练，募集数车防汛物资3次上堤慰问江汉、江岸和硚口三区守堤队伍，成了公益路上主动靠前、名副其实的先锋队。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在后方护航，我为我们的团队感到自豪。商会会员传承着妈祖“立德、行善、大爱”的精神，不畏艰险，挺身而出，展现出的硬核担当受到多方好评，被全国工商联评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商会”，还被授予“江汉区抗疫先进集体”和“感动江汉”人物荣誉称号。

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我是排头兵，时刻不忘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激情付出、甘心奉献、无怨无悔，发挥着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作为一名会长，我是领头雁，始终秉承着“把队伍带好，把商会办好，把大家发展服务好”的信念，面对会员传统企业转型和复工复产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努力带领大家团结在商会周围，共同克难攻坚，加快转型升级，不断提升企业自身的运行质量，为这座英雄城市的建设发展添砖加瓦。

（林文豹：福建莆田人，湖北星光万顺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武汉市莆田商会会长；郭国松：武汉市莆田商会秘书长）

知难不畏难 勇于创事业

◇ 吴刚（口述） 金高良（整理）

（一）

我成长在素有“婺之望县”和“歌山画水”美称的浙江东阳，那是个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的地方，东阳人吃苦耐劳、开拓进取的精神潜移默化地熏陶着我。1998年，刚满17岁的我高中一毕业就选择踏入社会，走上了艰辛的创业成长路，一干就是20余年。创业的酸甜苦辣磨炼了我的意志，创业路上遇到需要选择的时候，我曾犹豫彷徨过，但经过慎重思量，仍会坚定不移地将创业之路坚持到底，也许就是这一次次的选择，为我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刚开始，我跟随亲戚跑货车，走出了闯荡社会的第一步，心中创业梦想的种子随之开始发芽。恰逢当时长途货车运输行业形势渐佳，我心想这既可掌握一技之长，又可

以开拓眼界，而更多的是能为我未来的创业之路做好铺垫，积累经验。这更增添了我创业的坚定信心，让我深信：“推心委任，坚定不移，则天下何忧不理哉。”

工作最初的时间里，我开着大货车在外跑运输，奔波往返于东阳和广州之间，尝过饥肠辘辘，也经历过风雨辛苦，这些都不曾让我有丝毫抱怨。“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我坚持着自己的选择，克服困难往前、再往前。渐渐地，我将运输这个行业的门道摸了个透彻，可以说是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了。

我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需要更广阔的空间来发展。我开始深刻规划以后的方向，思考自己未来的人生。我进入到父亲从事多年的门业生意后，发现其商业空间潜力无穷，于是毅然决定正式进军门业行业。为了弥补门业方面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不足，

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学习和实践,刻苦钻研,不懈努力,很快便掌握了相关的经验和技巧。“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在我的艰辛付出和用心经营下,家里的门业生意日益红火,我也有了一点小积蓄。

然而,我又开始寻求向外的发展空间了。武汉作为华中地区的核心,被我看中。1999年,我带着弟弟一起从浙江东阳来到了湖北武汉创业。兄弟俩一起在舵落口大市场租了一个小门面从事木门批发生意,起早贪黑,吃苦耐劳。

2003年,我们兄弟俩在武汉打拼已有四年,当初青涩的小伙已经长大成人,到了该自立门户的时候了。父亲拿出40万元作为我们兄弟俩的创业本金,并提出一个要求:两个儿子,一个留在浙江老家,一个继续留在武汉。

回到老家陪在父亲身边,有熟悉的一切,有父亲的帮衬,还有父亲多年积累的生意资源,事业发展自然要轻松许多;而留在武汉就意味着需要独自打拼。当时我们在武汉做的是低端跑量业务,客源主要是湖北下面县市的批发商,行业竞争激烈。如果安于现状迟早会被市场淘汰,要想在武汉立足,就要建立自己的生产线,做自己的门业品牌。可是分家就意味着这个愿望只能交给一个人来实现,这条路的艰辛不言而喻。

这不是一个公平的选择,我们俩非常为难。父亲提出:抓阄决定。抓阄的结果是我留在武汉。从此,我真正意义上的创业之路开始了。

(二)

万事开头难。我成立了湖北亿年工贸有限公司,在公司最初成立的那几年,我处

处受挫,跟所有创业的人一样,创业初期是最辛苦的。建厂、研发、生产、销售全部都要亲力亲为,工厂建在老家,我就常常湖北、浙江两地跑,那个时候交通没有现在方便,经常都是晚上赶路白天做事。刚出来的品牌在市场上难以立足,销量上不去,曾一度让我的企业陷入困境。面对困难我没有放弃,反复考察市场,改善产品性能和质量,不断摸索新研发产品的销售策略。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经挫折,我的门业产品终于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事业渐渐有了起色,企业运营也步入正轨。

2004年,事业略有所成的我与妻子步入婚姻的殿堂,成立了小家庭。那时,门业生意的重担全部由我一个人承担,妻子在看到事业上的艰难后,毅然放弃了人民教师的优渥工作,投入到我的事业中。

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我意识到未来套装门的兴起或成大势所趋。2007年,我开始筹划转做套装门,并着手和同行商议关于套装门技术的研发、加强耐用性等方面的问题,一步步把生意的重心转移到套装门上来。可新产品投入市场之初,产品的认可度不高,销售量难以上升,效果并不理想,那段时间我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即使在那么艰难的境况下,我也从不曾抱怨,更不曾放弃。“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经过不断的深思、反复的市场考察,在理清思路和目标后,我重新燃起了斗志,详细整理市场反馈的信息,改进不足之处,在经过反复的研究和改良后,我企业的产品终于获得市场的认同。

在新技术和产品得到市场肯定后,我精心经营,视顾客的需求为己任,一直坚持的“低价策略、微利信誉、最高性价比”经营理念倍受消费者赞许和青睐,企业生产的

高档强化烤漆门、免漆门、复合实木门、钢木门都成为当时的热销产品。暂时的成功并没有让我感到满足而固步自封，我认为只有不断创新产品，做大品牌影响力，才能让公司在行业里取得长足发展。因此，在产品更新和技术研发方面，我不惜花费重金并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公司已拥有全自动数控机床设备和独有的技术力量，室内套装门年产量超过 10 万套，产品远销全国各地。

2008 年，我把工厂搬到了武汉，公司经营范围也从门业产品扩大到高端整体家居定制。我始终秉持“让合作伙伴创富致富，让亿年盛世的用户放心舒心”的服务理念，留住了许多老客户，并和一些客户成为很好的朋友。

一直在门业市场里摸爬滚打，我发现成品门的竞争太大，湖北的半成品门市场倒是存在很大空白。于是，我把目光转向模压板市场，经过一番考察后认为这个市场将大有可为。说干就干，2012 年，我在孝感市孝南开发区拿地 50 亩，先后投资了近 1.1 亿元用来建设厂房、购置设备。从 2013 年投产到现在，产值逐年攀升。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然而，“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2016 年的一次水灾差点让我的事业回到起点。

（三）

2016 年 7 月 21 日凌晨，受强降雨影响，孝感市孝南开发区府河堤子堤出现漫堤、溃口等险情，大塘角防洪坝出现 40 余米溃口，直接导致东山头工业园区、东山头街等多处被淹。灾害突如其来，没有任何防范措施，

我的工厂被一片汪洋包围，工厂设备、材料和成品全部被浸泡在 2 米多深的洪水中，直接经济损失 2000 多万元。看着这个自己付出了多年心血的工厂，我欲哭无泪。那段时间，我比创业以来任何时候都过得艰难，望着汪洋中的工厂我问自己：能再站起来吗？所幸我一直比较注重风险意识，工厂建立之初买了保险，这时候保险公司赔付的钱能把欠供应商的货款还上一些。

洪水退去后，工厂的设备和材料全部陷在淤泥里，50 多亩地的清淤工作量巨大。对于什么时候能恢复生产，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开发区政府部门领导十分关心受灾商户，派了大量人手帮助进行灾后重建，再加上我的一批老员工在企业前途未卜、经营最艰难的时候选择了与我并肩作战，鼓励我东山再起。就这样，历时半个多月，淤泥终于被清理干净。我的那些供应商们也很给力，他们给我延长了账期，没有一个催着我要货款。经销商们得知工厂受灾，也没有为难我，主动把交货的时间往后延。这次受灾让我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暖意，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振作起来，咬紧牙关带领员工走出困境，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才能不辜负这些期望和鼓励，才能更好地回报那些帮助过我的人，为社会尽一己之力。

那段时间，我每天起早贪黑，跟着员工一起干，终于在两个多月后恢复了生产。回首往事，那是我有生以来记忆最深刻的一年。刚开始单干的时候苦，但那个苦不曾让我有崩塌绝望的感觉，因为那时事业刚刚起步，失败了大不了从头再来。而这一次不一样，我举全家之力，把生计全部压在了工厂里，工厂运营成本还没完全收回来就遇到了水灾，如果这次站不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四)

成大事者必当胸怀天下，于我而言无论是创业之初的小本经营还是现在的小有所成，我始终没有忘记尽自己所能帮助身边的人。热心公益、乐于奉献在我看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积极加入政协、工商联和商会组织，积极向政府建言献策，为企业传递心声，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我在武汉市金华商会成立之初就加入了商会，商会是非营利性质的平台，商会成员都是在异乡做生意的同乡。商会事情多，需要每一位成员都奉献一些才能维持运转，常常要放下自己的本职工作为商会跑腿出力，我已经记不清做过多少次这样的事情了。我在商会从普通会员到担任副会长，再到如今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这是大家对我的信任，也是一种荣誉。我打心底里想把这份工作做好，也没有想过要得到什么回报。我尽己所能为商会举办年会提供礼品赞助，中秋节为每一位会员送去月饼，为商会新办公室装修免费提供会客室、会长办公室、洽谈室等全套高档红木家具等。此外，我还积极参与助学、敬老、赈灾、扶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社会公益活动，通过不同渠道捐款捐物，为政府分忧，为民众解难。

(五)

万千世界，千变万化。我无法肯定自己选择的难度，可是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我深知止步不前，就会被淘汰。经过20余年不断努力，我公司已发展为占地50亩、拥有3万平方米现代化标准厂房的湖北亿年工贸产业园，年产值达9000万元。

以生产模压板为主，同时拥有“亿年盛世”品牌，包含“亿年盛世整体家居”“天成木业”，产品种类涵盖定制家居、整体衣柜、整体衣帽间、橱柜、鞋柜等三大系列品牌上千种产品，并在全国多个大城市开设了形象店，其中竹叶海红星美凯龙的亿年盛世旗舰店是位于武汉市的一家形象店。公司通过了国际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成为国内专业生产零甲醛定制家居的规模性企业之一，其中高端定制品牌家居“亿年盛世”，通过技术研发和创新，获得“中国著名商标”“经销商最推崇品牌”“质量、服务、信誉AAA企业”“中国绿色环保产品”等多项荣誉。

数度耕耘，人生成长。发展至今，我人生每一次重要的选择都在向前迈进，使我离成功更近。回想这20多年我走过的路，一路上有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有父母无私的爱，还有老一代浙商的激励和鞭策，我相信亿年工贸一定能够越走越远，我一心执着追求的“行业类最优秀的公司”目标定能实现。

(吴刚：湖北亿年工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孝感市孝南区政协委员，武汉市金华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金高良：武汉市金华商会副秘书长)

我是通信战线上的一名战士

◇ 潘圣宇（口述） 白爱萍（整理）

我叫潘圣宇，现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数据维护室主管。

刚刚过去的2020年，对于我来说，无疑是浓墨重彩的。这一年，从战疫到助力复工复产及重点保障，我步履匆匆、躬耕不辍。2020年11月，我走进了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从国家领导人的手中接过了“全国劳动模范”荣誉证书。

全国劳动模范只是一个称号，我也只是通信战线上的一名普通战士。

（一）

电信人也是战士，这个信念坚定于2020年年初的火神山医院战场。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战疫。有着多年网络维护经验的我在第一时间敏锐地感受到了自己即将承担的重担：疫情之下，冷清的是大街小巷，繁忙的是连接世界的网上通道。疫情期间，网络服务不但成为亿万宅家民众的刚需，也是疫情联防联控的重要保障。我立即和同事们打招呼，要求大

家进入战斗状态，做好打硬仗的思想准备。我在工作群里发了这样一段话：“电信人不是白衣天使可以救死扶伤，但是通信保障一线也是战疫前线，电信人也是战士，党员必须靠前。”

我召集数据维护室党小组的11名党员，通过手机在互联网上重温入党誓词，并组建了党员突击队，投入了战疫第一线。很快，我和团队接到了疫情期间的第一个突击任务：为正在建设中的火神山医院开通40G超高专线，保障央视对火神山医院建设的慢直播。

此次慢直播，不仅要用最短时间上线，将医院建设现场动态向全球直播，还要避免海量用户同时收看的高并发流量对平台和网络造成冲击，更要规避现场施工可能造成的网络中断风险。时间之短、难度之大、要求之高前所未见。我和同伴们个个成了“拼命三郎”。我在冷静分析后制定了高可用性、高冗余性、高扩展性、高安全性的“四高”方案，依托天翼云海量计算资源解决高并发流量下平台和网络瓶颈，并火速完成安装、

调试和应用联调工作。在众志成城之下，15个小时内，火神山医院建设的视频直播项目上线，全国1.2亿“云监工”通过直播见证了武汉希望和中国速度。

前脚刚为火神山医院开通40G超高专线，在火神山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间搭起远程会诊通路，我后脚就前往雷神山医院工地，去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6个小时内开通雷神山医院电力调度网络专线。

易信、钉钉、微信、QQ……每天都在各个协同办公软件之间来回切换，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有多少个通讯群，群太多时只能编号，仅火神山医院便有十几个群，包括院方、基建、供电、央视等各路人马，连睡觉时都不敢开静音，更不敢睡得太沉，只要听到消息提示音连续响起，我便会清醒过来。

就这样，我和我的团队顺利支撑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高科技战疫，随后又为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开通了两条千兆宽带。

疫情的发展容不得我们喘息，2020年2月上旬开始，一座座方舱医院在武汉陆续投入使用。迫在眉睫的是，要在最短时间内传达疫情的诊疗防控信息，也要最大程度地保护医护人员、工作人员的安全。

2月6日到12日，武汉全市26家定点医院、33家方舱医院和隔离点，我和团队总计完成了59个点位视频会议网络的开通。这一周时间内，我的工作按下了快进键，每天都有新的任务。2月10日，我参与了武汉3个医院长途视频会议网络的搭建，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远程会议网络向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送去党中央的关怀和慰问。

最长36小时无眠，7×24小时轮值在线……4月8日，我和所有武汉人一起，迎

来了春暖花开城市解封的到来。为了这一刻，我和疫情期间坚守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新生儿ICU的妻子抛下了还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女儿，让其独自一人面对上网课的种种不适。在女儿眼中，我是“抱着电脑吃饭睡觉”的爸爸；而在同事的眼中，我则是组建私家车队每天接送武汉电信员工上下班的“平民英雄”。

封城两个多月，我和团队一共进行了2000多次保障，工作量比平日里翻了三四倍。英国在民众居家隔离的第二日发生了大量的网络故障，但是武汉网络撑住了，中国网络撑住了。

我在战疫日记中写到：“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让生命的信号永不消逝，让一线战士给家人报声平安，让亿万网友看见顽强的‘热干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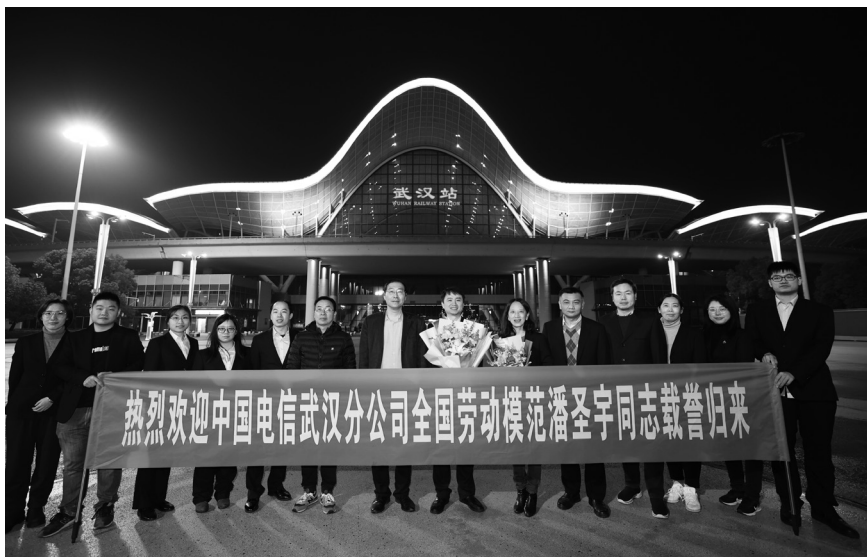
（二）

其实不仅仅在抗疫战场，战士的那种“随时待命，不辱使命”以及“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战斗精神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

2020年11月24日，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当站在人民大会堂奏唱国歌时，我哽咽了，疫情期间的忙碌与奋不顾身，此时此刻我才有时间去回味。武汉遇上事儿后，强大的祖国给了我们强大的支持，武汉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后面我们要把工作做好、把生活过好，让武汉变得更好。

的确，武汉解封后，我和我的团队并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就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助力复工复产的战役中。

4月，我对中小企业疫情期间网络使用



2020年11月24日，潘圣宇（右七）参加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后载誉而归

情况进行核实，对未使用的网络进行费用核减；5月，我带领团队实地走访用户300多家，协助处理用户网络故障；6月，为排除经过超长假期后校园的网络隐患，我通过技术手段对武汉校园网实施网络健康检查；8月，武汉高校陆续开学，我深入校园排查网络故障20余次……同时，我和团队承担了复工复产大会、直播带货会、武汉国庆慢直播、“双11”黄鹤楼重保、5G和工业互联网大会、好声音决赛等70余场次网络保障工作，依托自主开发的保障调度平台，实现了保障期间网络零故障，为武汉进一步复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20年6月14日21:23，我接到了一家在汉大型企业网络负责人的电话，用户在实施涉及武汉、广州、郑州和十堰节点的全国网络迁移中遇到了技术问题，需要在8个小时内解决。接到电话后，我很快定位是用户网络问题，但是他们一时没有头绪。面对焦急的用户，我一边耐心核实问题现象，一边仔细核对设备上的每一个参数设置。用户设备众多、配置复杂，仅核心设备就有

10多台，每台设备的详细参数有200多行，如果按照常规方法即便是找到问题，也已经超过了处理的时限。凭借多年运维经验，我通过分段定位法、替换法逐步缩小故障范围，最后在接到电话的4小时53分钟之后，定位到了具体的参数设置问题，调整参数后，问题迎刃而解。此时已是凌晨2点多，

看着恢复稳定运行的网

络监控报表，用户在电话里激动地说：“如果今晚问题没有解决，明天一早就会影响我们所有生产线的运转，损失将非常巨大，后果不堪设想，太谢谢了！”并专程发来感谢信表示感谢。

平时办公室里大家都在埋头工作，除了键盘敲击声和接电话的声音，没有别的声音，可是在我看来，这就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

这是专注于战斗的声音。

（三）

是战士就要握好手中的武器。对于我来说，我的武器就是所维护的电信IP网络。为了掌握好这个武器，我不断推陈出新，努力为中国网络的快速发展插上腾飞的双翼。

2007年，我从基础网络维护人员转型为一名IP网络维护人员。那时，武汉电信正站在“光进铜退”进程的起点，我连续大半年加班实施IP城域网双层VLAN改造。网络改造时间紧迫，还要避开用户使用高峰

期，所以常常选在夜间，连续进行数百项测试。那段日子里，凌晨2点回家是我的常态，白天还要正常上班。所有的辛苦，都只是为了不影响用户使用。

作为一名网络维护人员，我十分关注网络安全问题。IP地址是互联网的唯一身份标识，我国目前所用的IP地址大多为IPv4，而由于对互联网井喷式发展预计不足，IPv4的地址空间有限，特别是我国作为后发的互联网大国，话语权很弱。美国人均拥有的IPv4地址是我国的31.6倍，同时IPv4的域名解析顶级节点全部在海外，我国10多亿网民的网络安全受制于人。这个劣势和潜在的风险让我十分着急。

为解决这一问题，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共同发文，推进下一代互联网协议IPv6规模部署。IPv6有着充沛的地址空间，能够为地球上每一粒沙子都分配一个IP地址。在IPv6体系下，我国拥有4个IPv6的全球域名解析顶级节点，网络安全不再受制于人，也将极大推进我国车联网、智能家居、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的发展。

从IPv4到IPv6，就像是要给汽车装上翅膀飞向天空，难度之大可以想象，涉及到终端、网络、应用等端到端全程的兼容性和改造等诸多问题。如果按照传统思路实施全程升级改造，IPv6商用将因为涉及面太广变得难以推进。面对困境，我没有退缩，带领团队成员经过深入分析，创新性地提出使用软件客户端+静态隧道+汇聚处理，推广IPv6的方案仅需集中部署一台支持IPv6的路由器即可覆盖所有汇聚设备，为全网所有用户提供IPv6业务，在拥有自主专利的中心端设备上，实现IPv4和IPv6的灵活选择与无缝切换。这种方案具有投资少、部署快的特点，但也正是因为方案的原创性和业

务的复杂性，理论推演可行到实际规模应用间还有一系列繁杂的工作，困难重重。我带头奋战在一线，连续1个月每天身先士卒从早上8点一直工作到深夜两三点，眼睛熬得通红，终于解决了操作系统兼容、溯源、计费等问题，完成网络改造、客户端软件多达90种应用270项功能测试，最终在武汉校园客户中率先完成IPv6快速规模部署，并再接再厉将IPv6应用到中国电信的WIFI热点、政企客户和家庭客户中，率先在武汉开通IPv6用户26万，节省投资3021万元。该成果获评武汉市总工会首届创新创业大赛十佳创新项目、湖北省企业管理现代化成果委员会创新成果奖、湖北省电信微创新一等奖。

从2010年实施校园网升级及双速网业务上线，到2012年实施城域双速网，再到2013年实施校园IPv6软客户端部署，以及持续的宽带大提速，在此过程中，我逐渐从一名网络工程师成长为软件设计及测试工程师、组长、班长、团队负责人。这期间，我和团队获得的创新和应用成果奖项不计其数，我也记不太清了。现在，武汉城域网用户突破280万，天翼视讯用户突破100万，用户实现了从十兆级的“乡间小路”到踏上千兆“高速公路”，从“低码流”到体验“高清”视频的跨越。

对于中国电信网络未来5G的光明前景，我信心百倍、战意十足、斗志满满。最好的网络服务就应该像空气一样，自然且无感。这就是我的追求，我将永葆赤子之心，奋斗不息。

（潘圣宇：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数据维护室主管；白爱萍：武汉市总工会《武汉工运》编辑）

在珞珈山读书的日子

◇ 周 玲

2010年，我考上武汉大学，开学前两天先来学校踩点。那时候武大校门很小，门前是一条非常拥挤的道路，远远没有现在校门的恢弘大气、美观整洁。难以置信这会是百年名校的大门，待看到教五时，我感觉更失望，那样的设计和幕墙，怎一个“土”字了得。

如果说第一眼看到武大是失望的，那么李达园就是我改变印象的开始。对于梅园操场旁边的小片树林，可能每个人的叫法都不一样。但因为里面有李达同志的雕像，我们一般都亲切地喊它李达园。走到那边时，正是早上8点，清晨的阳光透过繁密的林叶洒下来，整个树林都氤氲着一层清澈的光晕。小树林里，很多学生或站着或坐着认真地读书，有的声情并茂，有的细声慢读，但都那么全神贯注，不比高三时的我们差，这一幕深深打动了我。高三一年，老师们常常对我们说，考上大学就解放了，就可以睡懒觉可以轻松可以玩了，我一直信以为真。但是当我看到李达园晨读的学

长学姐时，还没入学的我就已经明白，大学从来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而任何回报都要先从努力开始。

日后的很多时刻回想当初，都觉得这一幕奠定了我对武大的印象。武汉高校间流传着一句话：“玩在武大，学在华科，爱在华师。”但其实武大有很多爱学习的人，在清晨六七点，在夜晚十一二点，在小树林里，在奥场的跑道上，只是很多人不知道罢了。

入学第一堂课是阮桂君老师的现代汉语，阮老师建议我们每天早上6点半起来集体晨读，读古代经典即可。课后我们迅速地买了《诗经》《论语》《孟子》等书，开始了每天早上的晨读。

我们班女生都住在枫园十二舍，旁边就有一个篮球场。这个小操场在明晓溪的书里，是男女主角发生爱情的场所，在我们这里，却是每天早上晨读的最佳选择。小小的操场被中文系好几十号女生塞得满满的，每天刚出枫十二的门，就听到朗朗的读书声。集群效应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看到别人那

么认真读书，生怕自己落后了，于是更要认真更努力。有时候半个小时结束了，却还没人走，大抵学习也是一种能让人上瘾的东西。在这个小操场上，我读完了《论语》《孟子》和《老子》，虽然不求甚解，但也被这气氛深深感染。

阮老师的绝招还没完，他说我们中文系的学生一定要能看懂且会写繁体字，要有古文基础，谁能在一个学期内用繁体字抄完四书五经，期末考试就可以加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礼》《易》和《春秋》。一下课，大家匆忙赶去图书馆借书，手慢没借到的，就得自己买了。为了这5分，我们开始了抄书生涯。这也是我大一时期最宁静温馨的日子，抄书能让心思沉静，每当我坐在枫园自习室，在一片静谧中，安安心心抄写四书时，所有纷乱的杂念便全没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抄的过程也是读的过程，遇到佳句总忍不住反复咀嚼，常常与室友小白一起感慨，经典不愧是经典。偶尔我也想玩，就会让表姐下班后过来帮我抄写一下，她写的字跟我如出一辙，我自己都分不清的。她抄完了，我就把她抄写的部分读几遍，然后在心里默默忏悔：阮老师对不起，我今天偷懒了，但是我在精神上抄写了一遍。偷懒过一次，看到小白那么勤奋认真，心里越发惭愧，下次便不敢再偷懒了。

印象中阮老师还有个绝活，那便是抄写《新华小字典》。他让我们每人都买一本小字典，把所有不会的字包括拼音、释义等，都抄写下来。去买字典的路上，我和小白笑言，这个任务应该很好完成。待开始抄写时，

便发现大话说得太早，不认识的字太多了呀。大一的第一个元旦假期，我们宿舍四人在埋头苦抄中度过，偶尔有交谈也是：

“你抄到哪个字了？”

“抄到fang了，你们呢？”

“天啊，你好快！”

就这样，三天假期，我们抄完了小字典里所有不认识的字，怕是也只有读书时，才有那样的激情和效率。

大二时，我们上高文强老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高老师课上笑眯眯地告诉我们，他是要抽背的，背得又快又好的，期末加分。课前他都会把要背的内容告诉我们，记得第一篇就是《诗大序》。每天8:40上课，我和小白7点半就到李达园开始背书。清晨的树林温柔静谧，鸟声清脆，晨曦微光轻柔地拂过来，人仿佛要与环境融为一体，哪怕大声念着“《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也不觉吵闹。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多了自然懂得其中意思，那背起来就更容易了。一天之计在于晨，记得这篇课文，我当时一个早上30来分钟就背下来了。

后来背曹丕的《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原来这句话是从这里来的，待读到“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深以为然，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当读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

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时，则被深深折服了，反复吟诵，觉得曹丕真是个人物，见解独到，让人茅塞顿开，原来文章有如此大用，连皇帝都这么重视，我们更要有信心才是。自那以后别人再问我学中文有什么用，我就微笑着告诉他，多读点书，你就知道答案了。心里却想着，这个人到了古代拼死也就是个百夫长了，决计是做不了皇帝的。

等学到佛教文学时，文强哥（我们班对高老师的爱称）便让我们背《心经》。《心经》第一段很好背，第二段简直考验人的普通话，但是背下来之后，走到哪里都有底气了。每当我夜晚从图书馆回枫园经过黑漆漆的小树林时，便在心里开始默念：“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最明显的要数去武汉欢乐谷鬼屋了，一进去就开始默念《心经》，心里十分有底气，当那些“鬼”对我喷气时我就哈哈大笑，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当他们

扯我衣服时，我就扯回去，拽着那些“小鬼”玩……敢吓我，我可是会背《心经》的人呀，有菩萨保佑呢。出去后看到别人惨白的脸，油然而生出一股自豪感，觉得自己十分厉害。读好中文系，鬼屋也不怕。

读书的日子就是这么欢乐，有些老师虽然不要求我们背书，但看书抄写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叶李老师的现代文学史，我们要跟着看现代作家的作品。有一次，叶老师布置了一个课后作业，让我们搜集现当代以来武汉作家的作品，或者现当代作家中与武汉相关的作品，整理成册，做成编年史一样的东西。在图书馆翻阅资料时，方感觉老师的用意，这个搜集的过程，也是对作家们系统了解的过程啊。那次作业我选择了凌淑华，信心满满交上了作业，自觉做得很棒。上课时，老师拿出一本厚厚的装帧精美的书，告诉我们，这是班上一位女同学交上的作业。她搜集了选择作家的所有作品，还做了引言和笔记，自己设计了包装，完全以做一本图书的态度在做作业。我听后十分汗颜，与优秀的同学相比，我做的远远不够啊。

我们的古代文学史上四个学期，四位老师都会要求背诵、默写之类的。曹建国老师教先秦两汉文学，我们便要背一些大赋、小赋。也是在这个课上，我才知道张衡不仅仅发明了地动仪，人家语文、数学都很好，《二京赋》《归田赋》便是他的代表作。陈顺智老师教魏



2014年6月，周玲（右二）和同学在武汉大学毕业留影

晋南北朝文学，那诗歌乐府逃不掉。王兆鹏老师教唐宋文学，就更不消说得了，读书笔记一学期要交10本，还要完成100首诗词抄写与赏析。结果到了期末，我们写不完10本笔记，便让学习委员黄爽去求情。王老师很仁慈，心疼我们学业繁重，便答应笔记交5本即可。

陈水云老师的明清文学则相对轻松，因为到了我们熟悉的领域，明清很多作品我们从小就开始接触了，但是《牡丹亭》里“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桃花扇》里“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过风流觉，把五十年兴亡看饱……放悲声唱到老。”依然让我们肝肠寸断，一遍遍吟读背诵，体会文学之美。

大三上学期上李松老师的西方文论原典研读。他住在汉口，每天早上要打车过来给我们上课，李老师笑言课时费不如打车费。每当看那些理论书籍看不下去时，想想老师的打车费，又有了啃下去的动力。让我惊讶的是，我读《理想国》白话版就很费劲了，居然在诗社看到郑韵扬同学读着文言版的，深觉自己和学霸之间还隔着十来个学酥。最后实在没办法，天资愚钝的我在图书馆C区3楼的楼梯间里，把李老师上课讲的理论全部都硬背下来了，好歹应付了考试。这大约也是我硕士毕业之后没有读博的最大原因，总觉得学术科研这么崇高的东西，没有天赋实在不敢沾染。

同样需要交笔记的还有涂险峰老师的西方文学史课，涂老师要求我们每学期交8

本读书笔记，3本理论类的、5本文学类的。我正儿八经看西方理论是亚里士多德的《诗说》，第一次看我就陷进去了，后面的日子又看了好几遍，读到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时，又深觉以往都小看了他，可惜《存在与虚无》太大部头读不进去。在这个课上，我们被瑰丽灿烂的西方文学深深吸引，那是跟中国文学截然不同却又同样极富魅力的文化。涂老师讲课很有趣，又特别擅长讲冷笑话，往往我们还没反应过来，他先笑了，我们只好跟着笑起来，笑着笑着，大家领悟到笑点，就笑得更大声了，整个教室洋溢着欢乐的气氛。西方文学史的课虽然在偏僻的教一，但因为特别火爆，很多同学中午不回去休息直接跑去占座，去的晚了就只能坐在角落里了。内卷过于严重，导致我和小白也不敢再回宿舍午休了，吃完饭便直奔教室抢占座位。

涂老师的西方文学史课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因此当年保研古代文学失败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开启了珞珈山后三年的学习生涯，最终在与莫迪亚诺的思想交融中，完成了研究生学业。

时光如流水，如今毕业一年，回首过往，当年苦尽是今日甜，当年同窗散落天下，虽很少相见，想必见面时依旧一样亲切。这个清明节我和小白重回珞珈，在李达园看到读书的学弟学妹，回想起当年我们读书的日子，只觉千般情感盈满胸腔，遂下笔成文，不求文思优美，但为真实记录，若干年后再回看，定又是另一番光景。

（周玲：武汉大学中文系2010级本科生、2014级硕士研究生。本文写于2018年）

华中工学院机械厂孵化记

◇ 周爱民（口述） 苏明华（整理）

1954年，随着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四个学校的实习工厂合并组建了华中工学院机械厂。当时机械厂的机械设备主要是从武汉大学实习工厂搬来的，我也随武汉大学实习工厂一起转到了华中工学院机械厂。

当时武汉大学实习工厂除了负责工学院的教学实习外，还为理学院制造和修理教学仪器。实习工厂机器设备先进，工人技术水平高，工厂对教学和生产安排合理、管理严格，经常与武汉市有关单位协作生产，用收入添置必要设备和改善工人的生活。实习工厂还接受国家委托生产水泵。

搬家之前，武汉大学实习工厂坐落在珞珈山东北角的山坳里，地处一块平整的长方形山地，四周青松翠柏，草木丛生。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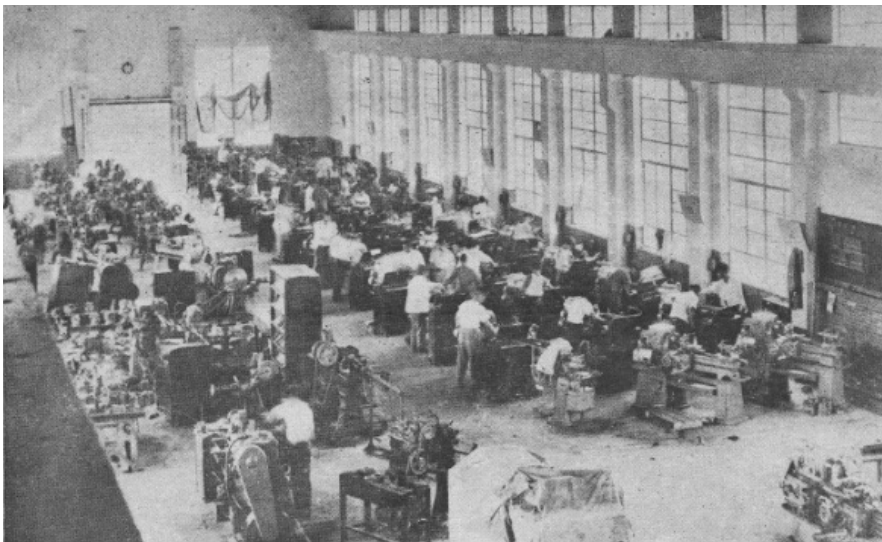
厂靠近东湖边，只有一道堤坎和一条马路与湖水相隔，离武汉大学游泳池约200米远。

夏天，有的青年工人在游泳池边的跳台上纳凉、睡觉。工厂有独立的铸造间、锻工间和木模间（搬到华工后统一叫车间），坐北朝南。厂门前有一个篮球场和一个足球场。当时武大实习工厂的篮球队在武大和武昌区小有名气，常有赛球喜讯。主厂房内有金工间，与厂办、教室和天井是三跨、长方形结构。实习工厂的教室可坐近80人，1949年工厂招收青年工人时，将实习工厂的教室作为考场，语文、数学、政治和其他科目的考试都在那里进行。当年一共招收了20多名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工人，我就是其中之一。这些青年工人全都是男生，年龄在14到18岁之间，后来成为工厂的中坚力量。1949年，我进武大实习工厂学的是钳工。

实习工厂的领导对青年工人的文化和技术水平提高一直抓得很紧，给工人们开设了初级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等课程，实行半工半读教育，由师傅们手把手进行技术指导。

1954年，华中工学院在喻家山的东二楼、东三楼、东四楼、西一楼、西三楼、机械厂和老图书馆已建成，东一楼正在建设中，

学生宿舍、食堂、医院、教工住宿区也已初具规模，于是决定将武汉大学实习工厂的机械设备搬迁到华中工学院。当时的条件相当困难，没有吊车，就用三根结实的木头在厂门口支起三角支柱，上面捆着装有滑轮的绳索，这样做成一个简单的吊装工具。工人们用滚筒加撬杠，人拉手推从厂里将机器运到支架下，再拉动滑轮的链条把机器放在汽车上拖走。1954年六七月间，连降大暴雨，长江水位持续上涨，武汉市正组织防汛抗洪工作。7月8日，大雨滂沱，路滑车紧，实习工厂的职工把一台台设备运往喻家山华中工学院机械厂。由于人手不够，不得不把前往武昌区参加高考的青年工人召回来参加搬运，移动很慢，很费力气，真有点像蚂蚁搬家，但大家想到要进新校区，精神就非常振奋。全部机器刚搬到华中工学院不久，在挖配电沟时，武汉的防汛抗洪警报拉响了。起初，学校动员全体教职工在喻家山和南望山挖土运石支援抗洪一线，后来为了稳定教学秩序，学校组织部分教职工组成战斗队赴前线参加抗洪抢险，我是队员之一。



20世纪50年代，华中工学院机械制造专业的学生在学校工厂实习

1954年搬家后，机械厂购买了一台乙炔发生器（加水可产生燃烧气体乙炔），建立了焊接车间。之前武汉大学实习工厂没有焊接车间，但是有几台电焊机，我也曾专门学习过这个工种。1951年，武汉大学实习工厂领导派我到汉口船舶修理厂学焊接。在老师傅的指导下，我每天仰面朝天学电焊，火花四溅，师傅看着我笑：“不在学校好好学习，跑来当工人。”学了几个月后，我回到学校。当时，实习工厂后面的动力大楼有间小房里就有两台电焊机，可算是一个小焊接间。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电机系与实习工厂结合非常紧密，这两个系1953年的毕业生在实习工厂实习过的工种很齐全，包括车、钳、铣、刨、铸、锻、焊、木模等。搬家到华中工学院，建立焊接车间后，为了安全，在焊接车间的东头建了一间小屋，专门放乙炔发生器。用管道将乙炔发生器产生的气体输送到车间各个放有氧气瓶的工位，氧气瓶上安装了减压表，氧气和乙炔气体各有管道与焊枪相接，可以进行气焊、气割操作。在武大

实习工厂原有电焊机的基础上，又添了几台，在焊接车间的另一边搭了几间木板房，让电焊的闪光互不干扰，教学实习就在焊接车间进行。这样，可容纳一个班学生进行焊接实习的场地——焊接车间就孵化出来了。焊接车间建立不久，华中工学院就设立了焊接专业。从武汉大学实习工厂过来的青年工人，大部分学有所专，进步较快，除了指导学生实习外，还成为生产和科研骨干。

搬到华中工学院后，工人们又对金属切削加工车间的原有设备进行了调整和改造，特别是对原武汉大学实习工厂半数以上天轴传动的皮带车床、插床、小龙门刨床等机床进行改造，改成单机传动，废除了电机通过皮带传动到屋梁上的天轴、再由天轴皮带把运动传到机床的传动结构，大大提高了机械厂的现代化水平。之后进厂的人就看不到天轴传动的机床了，对学机械的人来说少了这方面的历史知识。



华中工学院建校初期的学校工厂机械加工车间

机械厂有金工车间、锻工车间、铸工车间、焊接车间和热处理车间共5个车间和1个库房。其中金工车间最大，厂房的中门可进汽车，备有起吊的行车，车间里有美国、加拿大和德国生产的机床，还有国产机床，一字排开，非常壮观。其他车间配套设施也很完备。这在当时很不容易，可以代表新中国自己设计的现代化教学生产基地，有许多影视单位前来摄影。库房在车间旁边，里面存放有材料、半成品和成品。

机械厂的锻工车间在原有设备的基础上增加了空气锻锤和专为生产大型零件备用的加热油炉。见证武大和华工锻工车间发展的陶毓斌师傅与院长朱九思年龄相仿，人称“陶八级”。1950年铸工车间刚建不久，我们在那里实习，多种模型均已做好，只等铁水浇灌，可是一个晚上过去了，铁水就是流不出来。当时专门邀请有经验的炉工李铁山师傅到学校进行指导，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流不出铁水的问题。热处理车间是搬到

华工后新建的，除普通加热炉之外，还自制了氮化炉，为后来生产镗床的镗杆氮化淬火起了保证作用。

后来，机械厂又孵化出了电机厂。原来在厂里很不起眼的电气维修小组在不长的时间里发展成为电机车间和后来的电机厂。

1957年，黄树槐

教授在负责压力加工实验时设计制造了一套电机的定、转子的冲片模。20世纪80年代中期，机械厂诞生了第一台0.6千瓦的小型电机，是当时机械厂生产小型台钻的配套电机。电机厂除生产一般电机外，还生产多速电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还为数控设备生产了配套的步进电机、交流伺服电机。之后，电机厂又有了长足的发展。

1958年，机械厂在机一系机床教研室和其他教研室的协同下生产了C617和C618型车床数百台，后来又生产了可控硅控制的镗床。20世纪60年代中期，工厂设计生产镗床，时任厂长蔡希贤要我参加调研。当时昆明机床厂生产的T618型镗床带支架，我没有按照他们的做，取消了后支架，从而生产了几十台具有我校风格的镗床。华中工学院与湖北省工业厅关系较好，通过他们，我校生产的产品有了部分销路，另外，我们自己也营销。

朱九思当院长时对机械厂的工作非常重视，经常到机械厂查看情况，并召集主要负责人开会指导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同事正在加班，朱九思院长来车间查看情况。听说这段时间机械设备性能好，他非常高兴，与我谈了近一个小时，仔细地询问设备的使用和维护情况。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天，我在南一楼操作镗床，一位同事跑来叫我，说朱九思来车间叫我去，并嘱咐我：“九思在生气，你要注意！”我来到车间，朱九思站在样板钻床旁，用手指着样板钻床问我：“这是干什么？”我笑着回答：“这是使用原机床上的附件，它可以把机床垂直工作时的运动改变成平行工作台的水平运动，现在正在铣削车床上的齿条。”朱九思弄清楚了情况后就没说什么，我送他离开车间。这台美国制造的样板

钻床全校只有两台，朱九思对它的使用非常重视。一车间用大龙刨加工小零件，没有少挨批评。为了提高产品质量，朱九思还专门召开工厂中层干部会，讨论如何使用“公差与配合标准”，会上决定尽量靠中间公差，以确保加工产品的精度。

机械厂地处教学大楼和图书馆之间，气锤一响，声音传遍华工，晚上开机也影响师生的学习和生活。因此后来将工厂搬迁了，这是很有必要的。铸造车间开始时设在厂房的跨度之内，先后两次搬出重建。

华中工学院机械厂孵化的经历说明，机械厂的建立和发展与院系和教研室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机械厂生产机床的辉煌与机械系师生的帮助分不开，电机厂的发展与电机系提供的技术支撑也息息相关。我认为正确处理工厂、院系和教研室的关系是机械厂发展的关键。

（周爱民：华中科技大学电机厂退休高级工程师；苏明华：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校园文化建设办公室主任）

援疆工作的片段回忆

◇ 周风华

2017年9月至2020年9月，我离开自己的工作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到我校对口支援的喀什大学开展援疆工作。三年时光，转瞬即逝。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在新疆这片神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也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援疆工作，我愿撷取其中的一些难忘片段，与朋友们共同珍藏。

初来乍到

抵达受援单位之前，中组部、教育部第九批援疆教师首先在新疆大学集中，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培训学习，了解新疆的区情和相关政策，学习援疆工作纪律，也是让来自天南海北的教师们稍事休整，适应新疆独特的气候和环境。当时我们住在新疆大学校内的红湖宾馆，一天的学习结束后，我和其他援友三三两两地绕着红湖健步转圈，惊异于

晚上10点的天色还是这么亮晃晃的。培训即将结束的当晚，宾馆大堂的昙花恰好盛放，整栋楼的援友都轰动了，纷纷赶来围观、拍照。这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昙花盛放的风姿，想到即将开启的新征程，心中窃喜，认为是个好兆头。

9月8日，在培训结业典礼会场上，我们见到了前来迎接我们的喀什大学时任组织部部长。这次去喀什大学的老师一共有四位：我和华师数统学院的范琼老师，南开大学的申进忠老师和南晓宇老师。我们在地窝堡机场和华师校办及学院的领导汇合，一起飞越1000多公里，从乌鲁木齐奔赴喀什。

到达喀什大学已经是当天晚上9点左右，学校给我们四人在后家属院8号楼，也就是喀什大学的援疆楼安排好了宿舍。宿舍是一室一厅一厨一卫，大约40平方米。虽然房间条件简陋，但是冰箱、电视、洗衣机

等家电设备都一应俱全，连床上用品、厨房炊具、餐具、米、面、油都准备好了，我们内心十分温暖感动。

9月9日上午，大家一起到喀什大学组织部报道。学校邓勇副书记宣读了关于我们四位老师具体工作岗位的文件，我被任命为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这多多少少令我有点意外。因为入疆之前我曾认真浏览过喀什大学官方网站，估计着自己可能会被安排到哪个学院。与我专业背景最契合的是法政学院，而且事先在学校官网上并未看到任何有关经济与管理学院的信息。从学校组织部出来，我们随即分头去各自的受援学院，这时我才知道，经济与管理学院是8月26日正式成立的新学院，目前学院领导班子还没有配齐，只有一位布瓦吉尔书记主持工作。

布瓦吉尔书记50岁上下，中等身材，体型丰满，装扮精致，开口带笑，中气十足，一看就是一位能干又好相处的女干部。在学院的欢迎见面会上，布瓦吉尔书记介绍了学院的概况，学院一共26名教职工，其中援疆支教教师竟然就有8人之多。会上得知当天正好是学院年轻教师欧阳红老师的生日，正巧第二天又是教师节，于是，布瓦吉尔书记提议大家下午下班后一起去吐曼河边的安萨尔民族餐厅庆祝一下。当晚，在这家装饰风格迥异的民族餐厅里，我不仅品尝到了各种民族美食，还认真请教了几位民族同事的名字发音和意思。“月亮仙女”约热尼莎老师绿衣飘飘，人如其名，其优雅温婉的气质让人油然而生向往；当天的“寿星老”欧阳红老师娇小玲珑，穿了一条喜庆的红裙子，言谈举止活泼爽快、热情得体。想到今后将要与这样一群可亲可爱的人共事，我初来乍到的不安减轻了许多。

晚上聚会之前，范琼老师所在数统学院的阿吉木老师，还带着我们华师来的一行五人去参观了喀什古城，感受了民族风情，并到阿吉木老师的姐姐家做客。阿吉木老师又当导游，又当翻译，开心之情溢于言表。虽然与阿吉木老师的姐姐语言不通，但维吾尔族同胞满满的热情和善意都体现在茶几上丰盛的瓜果点心里了。

当晚回到宿舍，我发了配图的微信朋友圈：“喀什第一天。十分安全，十分友好，十分美味，十分风情！众亲勿念！”

学维语与讲普通话

刚到喀什时，大概知道喀什地区的人口构成中，维吾尔族约占92%，哈萨克等其他民族约占4%，汉族约占4%。当地不论是商业店铺的招牌名字，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口头交流，维吾尔语是最常用的语言，普通话普及率十分有限。我的一些民族同事，相互之间也更习惯用民族语言进行交流。每次在办公区域听到他们谈笑风生的对话，我就会好奇地问上一句：“你们在说什么啊？什么意思啊？”不懂维吾尔语，确实已经成为我与当地人沟通交流的一个大问题。

9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早晨，我和范琼老师准备自己开火做饭，于是结伴去学校附近的一个露天菜市场买些蔬菜、羊肉。蔬菜比较好办，直接从地摊上拿起来称重就好，菜价超级便宜：皮牙子（洋葱）2元一公斤，大白菜1.5元一公斤。偏偏卖菜的维族老乡还特别豪爽，遇到3毛5毛的零头都主动抹掉，让我们感觉自己不是在买菜，倒像是在“打劫”。

牛、羊肉都是早晨现宰后一分两半，招摇地挂在路边的铁架子上或摆在案板上，

红润鲜嫩的质感，让人垂涎欲滴。因为语言不通，我们费了一番功夫，才知道卖肉的时候是剁到哪里算哪里，而且不同部位一个价，并不是指定部位、按部位区分价格。这样想要买点儿里脊肉可就太费劲儿了！跟肉贩子解释了半天也讲不通，急得范老师连英语都飙出来了。旁边走过来两位好心的粗壮大汉，试图理解我们到底想要买什么，最终还是带着一脸尴尬的笑容看着我们……最后，我们在绝望中放弃了鲜嫩的羊里脊，拍打着自己的大腿，喊道：“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卖肉的师傅终于明白了，手起刀落，咚咚几下，甩给我们两块腿肉。

拎着沉甸甸的两袋子蔬菜、羊肉，我们已经感觉筋疲力尽，没有力气再走回家做饭了，于是临时决定就在附近找一个地方吃午饭。路边有一家看起来还干净的小饭馆，里面四五张桌子，有民族同胞正在美滋滋地用餐。我们掀开门帘，看到一个四十多岁的

男人正占据着一张桌子在包饺子，一位和他年龄相当的维族妇女，大约是老板娘，系着围裙在厨房和餐桌之间忙进忙出。我们已经口干舌燥，也不打算徒劳地再用语言沟通了，于是用微笑跟老板娘打了招呼。老板娘也回我们一个羞怯的微笑，很有默契地递给我们一张过了塑的菜单。

看了一眼这张菜单，我们又傻眼了：菜单上密密麻麻有30多行字，但除了表示价格的阿拉伯数字，其他的文字都是弯弯曲曲的维吾尔文，我们一个字都不认得，甚至连食物图片也没有，这就是一点提示都不给嘛！刚刚买肉我们是一句话都听不懂，现在吃饭又是一个字都不认得，这才知道文盲的悲哀啊！幸亏范老师是数学博士，关键时刻，她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发挥了作用。打量了一圈店里的情况后，我们发现墙壁上是有一些食物图片的，而且旁边还有一些我们认识的阿拉伯数字。范老师提议：“要不我们就

比对菜单上的价格和墙上食物图片的价格，随便点一点吃的吧。”就这样，我们连蒙带猜地胡乱点了两样，对能吃到什么已经不抱太高的奢望了。老板娘给我们端上来的东西，后来我们才知道叫做炒面片。无论如何，她甜美的酒窝安抚了我们的辘辘饥肠。

对于自己瞬间变“文盲”这件事，我的内心是很有挫败感的，觉得自己应该学



2019年6月4日，结对学生阿布都瓦热斯的妈妈海仁古丽专程到学校看望周凤华（左）

点维吾尔语。所以当一周之后,学院开展“三进两联一交友”活动,安排我和三位民族学生结对子时,我非常开心,暗暗想着,这下好了,后面学维语的老师就有着落了。但是,随后在课堂上发生的事让我认识到,不仅仅是我需要学维语,让当地人,尤其是我的学生们讲好普通话,可能是更要紧的事。

我教授的是从少数民族预科班升上来的学生,都是各个民族的学生。某次在课堂上,我引用了一句《诗经》里的话,但底下的学生都没有任何反应。于是我随口问道:“你们读过《诗经》吗?”学生们都一脸茫然。我又不甘心地问:“你们知道《诗经》吗?”有的学生仍然茫然地摇头,有的却是一脸的无所谓。当时我的内心是崩溃的,深深地为我们的教育感到担忧。一个不知道《诗经》为何物的人,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大学生吗?能发自内心地认同中华文化吗?今天喀什大学的这些学生,未来一定是当地各行各业的精英,是这片土地的管理者。如果今天不做出改变,该是多么令人忧心的一件事啊。

也许是我平时在布瓦吉尔书记面前反复询问“你们在说什么啊?什么意思啊?”触动了她,也许是我给她报告课堂上关于《诗经》的担忧刺激了她,更重要的是她自己超强的使命感激励着她,10月的一天,布瓦吉尔书记拿出了一张“8小时工作时间讲普通话”的倡议书,让全院师生承诺用实际行动讲好普通话。此举得到了学校层面的认同,并迅速层层上报,讲普通话的人群、时间和场景也大大扩展,成为当地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为了帮助当地老百姓讲好普通话,喀什大学的老师们在自己结对扶贫的村子里办起了夜校,每周三晚上在村委会的礼堂为

村民授课。2017年12月,我们按照自治区的统一部署开展“四同四送”活动,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一周。在一周驻村期间,我还去观摩过中语学院的阿力木江老师为村民授课的场景:男女老少都早早地到了,但坐位子的时候,男女大体上还是分开坐的。小朋友们能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个教室学习,热情尤其高涨,表现尤其积极。

我结对学生的妈妈海仁古丽,年龄和我相仿,她原本是初中文化,没有学过普通话。在全疆上下讲好普通话的活动中,她也在疏附县自己的村子里认真学起普通话来。她第一次到学校来看我的时候,还需要儿子阿布都瓦热斯和同学们做翻译。临别之际,她拉着我的手说:“老师,我们,好朋友!我好多话,说不出。学好普通话,下次,我自己和你讲。”现在,我们已经是微信上经常互动的好友了,虽然我的维语没有长进,但海仁古丽的普通话可是说得越来越利索了。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她多次问候我:“老师,你好吗?你家人都好吗?我想你了。”如此真挚和直白的表达,真是患难见真情啊。

三年援疆,经历颇多。从最初的担忧不安,到中间的处之泰然,再到别后的相互牵挂,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只要放下成见、付出真心,中华民族儿女的心总是可以相通的。

(周凤华: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我的委员作业

◇ 汤维钧

2016年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我从市委接回了接替我在区委班子中分管工作的同志，回到区里，把他交给了时任江岸区委书记。随后，我给区委办公室主任打了电话，请求另外安排一间办公室让我临时过渡。19日上午，我召集最后一次班子成员会议，我说，感谢大家7年多来对我工作的支持，希望大家原谅我不细致、不周全的臭毛病，请求大家一如既往地支持新任领导的工作。几位同志说了几句依依惜别的话。然后散会，前后不到10分钟。

我在区委安排的9楼一间办公室里坐了12天。其间，上到11楼交接过工作。我说，除这几年个人的工作记录外，全部的文件、资料都在柜子里；如果对哪件事前因后果不大清楚的，我提供帮助；今后的工作，请按区委的要求大胆地干，我没有任何意见。

《诗经·大雅·荡》有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一位曾在武汉工作过的老

领导退休时，跟中办的同志说，历来政治人物大多很闪耀地登场，能够平稳退下来的，鲜见加少有。我完全同意老人家对这句话的解释。虽然我官做得没他大，经历的事比他少了许多许多。

10月31日，区委任命我为区政协党组书记，参与区政协换届前的有关准备工作。2016年12月8日，在江岸区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上，我当选为新一届区政协主席。新一届区政协领导班子中，留任的2人，新进的4人；区政协委员和常委也是按照上级关于换届的要求进行的，留任的不超过三分之一。因为接下来要去参加市政协的全会，列席省政协的会议，几天后，我主持召开了区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套开主席办公会，会上我讲了话，大意是：我们到政协工作，“不要把自己不当人”，到这个岗位的都是党组织按《干部任用条例》进行审核、推荐、考察的，走的提拔程序，都是相当级

别的领导干部；也“不要把自己太当人”，政协不是权力机关，是专门协商机构，不要怀念过去当一把手时的“一锤定音”“一呼百应”，要保持好的心态；在政协做人做事的办法是“自己把自己当人”，把人民政协当作一份事业，把组织的信任当成一份荣耀，把本职岗位当作职业生涯应尽的职责。记得我还说，在本届政协内，大家一起努力，“要么说点什么”“要么做点什么”“要么写点什么”。对我不按套路出牌的讲话风格，大家都笑了。

2017年4月底，全省政协主席培训班在位于江夏区藏龙岛的国家检察官学院湖北分院举行。培训班有项议程是分组讨论。小组召集人点名道姓：“老汤，你代表区政协主席发个言吧。”我应允了，说：“参加这个培训，我巩固和强化了对人民政协的感情，到政协来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我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话音未落，会议室里一阵笑声。坐在我旁边的某地政协主席还小声嘀咕：“老汤有意思，把毛主席都抬出来了。”我也笑一笑，其实我说的是真心话、大实话，不是官话、套话。

随后，我写了个《感谢人民政协》的稿子，投到市政协的《武汉文史资料》杂志，于2017年第9期刊出，略有删节，刊出前编辑来电话，建议标题改为《我的政协情缘》，这个我同意。

过去，在党政领导岗位时，我们有过太多的行色匆匆，有过太多的加班加点。转到政协，繁纷的事务一下子减少了，

来来往往也少了，如何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安宁？恰在这时，我在《人民政协报》上读到一篇《政协是个好地方》的文章，作者是江西某县才退下来的政协主席，他大赞政协是个学习修身的好地方、是个协商建言的好地方、是个从容做事的好地方、是个团结和谐的好地方。我深受感动，忽然产生一种冲动，想记录一下生活中的美，为定格“一届政协委员，一生政协情缘”作些努力。我强迫自己坐在键盘前，盯着电脑屏幕。这一年，我在《长江日报》“江花”副刊发稿2篇，在《荆州日报》“荆江”副刊发稿2篇，在《湖北日报》“乡里乡亲”版发稿4篇，所写的内容无非是回忆童年，记述故乡风物，也有陈年往事。其中，《家乡的牛皮菜》刊出后，腾讯、中国青年等好几家网站予以转载，阅读量尚可，现在百度还可以搜索到。关于我的高考经历的文字，朋友圈里一度流传，赚了好些人的眼泪。



2021年4月9日，汤维钧（左一）陪同武汉市政协主席杨智同志（右二）视察调研江岸区百步亭社区“协商在一线”工作

2017年1月初，陈一新同志就任湖北省党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后不久，来江岸调研，听说谡家矶片区还有几千亩的“留白”，很是高兴。当年的市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启动长江新城的规划工作”。区委主要领导给区政协下了任务单，必须在市政协会上为江岸发声。我与驻区的2名市政协常委和1名市政协委员，联合提出了《关于将江岸区谡家矶、幸福湾片区作为长江新城起步区的建议》，得到采纳。

“协商在一线”工作，在区、街一级如何推进？我们区政协的同志到全国党建工作先进典型——江岸区百步亭社区调研发现，政协在基层的工作不能单打独斗，更不能包打天下，应该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把各方面的作用发挥好，特别是“两代表一委员”的力量，都得整合进来。我们提出，协商的议题、协商的程序可以归纳为“竖起耳朵听，睁大眼睛看，面对面地议，脚踏实地推”。2019年9月4日上午，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同志考察百步亭社区，对此予以充分肯定。

总结一下这几年来我的委员作业，大致还有如下几件：

1. 十九大前，我撰写了《关于修改党章的几点建议》，据说，全国政协直报中共中央。市政协某专委会年度工作总结中对此有所提及，专委会的领导跟我说，市政协主席们知道这件事，感谢我为市里增了光。

2. 《中国政协》2019年7月登载了我的《提升建言资政质量要有真举措、下真功夫》一文，随后人民政协网全文转载。

3. 在《人民政协报》发表“豆腐块”一篇，标题为《那时候的高考》。

4. 《学习强国》湖北平台“每日一读”栏目先后转载我的散文5次，武汉平台转载文章1次。

5. 参加山东省《齐鲁晚报·齐鲁壹点》2020年清明节征文，散文《我的父亲》点击量接近2万次。

6. 参加湖南省政协《文史博览》杂志举办的“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征文，撰写的《漫卷诗书喜欲狂——致我的高考》收录进该社编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我与祖国共命运》一书中。

我的水平充其量只能算一个业余作者，我只是偶尔过一过敲打文字变成纸媒铅字的瘾。今年区级领导班子换届后，我将退出现职岗位，可能会在文字中多一点乐子。

我的这个作业，换算成高考成绩，上不了985、211等重点院校，上个省重点的一本还是可以的。40年前，我上的大学叫武汉师范学院，这是湖北大学的前身。2019年上半年，全市喜迎军运会，搞临街立面招牌的环境整治，大吊车开到友谊大道上，工人们在大教学楼的顶楼作业，先拆下一个“湖”字，再拆下一个“学”字，不知什么原因，中间的两个字保留了几分钟，没拆。这段视频被传到网上，各地的湖大校友很是振奋，纷纷留言：“我也是‘北大’的啊！”——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趣事一桩，聊作一乐吧。

（汤维钧：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十五届江岸区政协主席）

《光明日报》湖北记者站建站亲历记

◇ 肖志华

《光明日报》是中共中央领导的全国性综合日报，在北京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粉碎“四人帮”后，被迫停止活动的《光明日报》所属多省、市、自治区记者站陆续恢复。我是1978年8月至1980年5月在湖北记者站工作的，是记者站建站的亲历者。这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极具历史意义的一段经历，也是我人生价值的一次实践。如今我已步入高龄，抓紧作简要回忆，以为记者站的后来人及新闻史研究者作参考。

湖北记者站第一位记者

我原是武汉市长江日报社的一名中年记者。1978年8月的一天，报社党委副书记梁桂芳同志通知我，接中共湖北省委的指

示，选调我到光明日报社工作，随即成立《光明日报》湖北记者站。我是记者站的第一位记者，也是记者站的首任负责人。

当时，记者站没有单独的办公用房，是挂靠在省委文教办公室的，实行光明日报社和文教办公室双重领导。文教办公室委派秘书长涂一兀同志代管。因此，在文教办公室大楼内腾出一间空房，作为记者站的办公地点。

我是土生土长的“老武汉”，对地方情况比较熟悉，加之在长江日报社的工作实践，我同中央在汉新闻单位新华通讯社湖北分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湖北记者站、《工人日报》湖北记者站以及《湖北日报》、湖北广播电视台、武汉广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的同仁多有联系和交往，因此，记者站成立后，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了。

记者站第一篇《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新闻

当年,《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报道,在全国掀起了真理标准讨论的热潮,人们的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各地的工作重点都逐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学习技术、发展生产,已逐步成为人们的迫切要求,而这正是记者站首要注意抓好的新闻课题。那时,《长江日报》原记者、武汉钢铁公司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章重同志找到我,希望能介绍武汉钢铁公司近期如何加强职工的技术培训、提高技术水平、大力发展生产的情况,并已拟好一份初稿,供《光明日报》选用。我看后如获至宝,连声说这真是一篇非常好的新闻报道。经研究,我二人对这篇报道做少许充实后,及时寄送至光明日报社。

1978年10月28日清晨,我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当天《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武汉钢铁公司重视职工技术培训发展生产》。这是我们记者站工作后,第一篇成功地为《光明日报》提供的新闻报

道。武汉钢铁公司是武汉地区乃至全国超大型国企之一,对它的宣传报道,可以想象,其影响之大、效应之广,是不言而喻的。

参加中央新闻单位代表团赴葛洲坝采访

1978年12月7日至14日,我受光明日报社指派,和报社记者部记者张安惠同志一起,参加中央新闻单位代表团赴湖北宜昌葛洲坝参观采访。当时参加的单位还有新华通讯社及其湖北分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人日报》等中央媒体及其所属湖北记者站的记者及有关工作人员,共30多人。

葛洲坝位于长江三峡出口南津关下游2.3公里的宜昌市境内,是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兴建的长江干流上第一座水利枢纽工程。1970年12月动工,计划要到1988年才建成。按设计要求,此坝建成后,具有



1978年12月,肖志华(一排左六)参加中央新闻单位代表团赴宜昌葛洲坝采访留影

发电、航运、旅游等综合利用效益，是我国当时正在兴建的最大水利枢纽工程。

那时，我们一行是乘坐东方红 46 号大型客轮，经 4 天水路行程，才到达目的地宜昌的。当我们来到葛洲坝坝址时，工地上还是一片忙碌的施工景象。经过参观采访，共同商定由新华通讯社湖北分社负责写出通稿，供各参加单位在当年 12 月 26 日毛主席诞辰 85 周年时同时刊发，以此纪念毛主席批准兴建葛洲坝工程。

参加《光明日报》全国各地记者站记者会议

我到湖北记者站工作后，先后两次参加《光明日报》全国各地记者站记者会议。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光明日报》第一次全国各地记者站记者会议就是在三中全会后，于 1979 年元月 8 日至 19 日在北京中直招待所召开的。会议内容主要是传达学习三中全会精神，对各地记者站如何贯彻落实、迅速开展工作提出具体明确的部署，要求发扬主动精神，逐步克服困难，把主要精力放在有指导性的报道上，争取一个月或两个月能有一篇好报道。会议由报社记者部主任卢云主持，总编辑杨西光等报社领导接见了全体记者，并合影留念。

第二次记者会议是 1979 年 6 月 18 日至 23 日分大区召开的。中南、华东两大区的各地记者站记者全体到南京市军区招待所参加会议。会议通报全国建立记者站 28

个，有记者 54 人，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工作情况，平均每月发稿 70~80 篇，并产生了一批好稿子。会议要求认清形势，讨论落实报道计划，进一步做好记者站工作。

参与兴建记者站办公、住宿用房

湖北记者站的住房条件可以说是空白。我到记者站工作后不久，听说文教办公室正计划在武昌洪山张家湾（湖北省委办公大院附近）筹建干部宿舍。我积极主动地请示涂秘书长，是否能够投资参与合建，以解决记者站的用房需要。感谢文教办公室领导对记者站的关心，涂秘书长当即就表示了支持同意。随后，我及时向报社提出报告并得到批准。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和实际需要，报社决定投资 10 万元参加合建。经协商，住房落成后，将为记者站分配 6 套两室一厅住房（每套约 40 平方米）。报社对这样的分配方案非常满意，认为这是对记者站的照顾。为了保证住房施工的顺利进行，我受文教办公室的委托，由记者站帮助解决施工奇缺的钢管、钢材和有关建筑材料。于是，我赶赴上海，在当地记者站的帮助下，克服困难，比较快地解决了问题，保证了施工的顺利进行。后来在具体分配住房的单元、楼层位置时，将记者站分配在一个单元的一边 1~6 层 6 套住房（该干部宿舍是 6 层住宅楼），应该说这是按计划合理的安排。但我经过思考，恳切地向涂秘书长提出，希望能把同一单元另一边的一层住房也分给记者站，以利记者站办公的需要。我的请求得到涂秘书长的同意。最终，记者站分得了 7 套住房，不仅有方便、宽敞的办公室，还能解决记者宿舍、男女招待所问题。湖北记者站在建站初

期较快解决住房问题，这在全国记者站中是少有的，在中南地区是唯一的。我深深地感谢报社和同仁的鼓励，也为建站取得的成果深感欣慰。

在解决住房问题的同时，我还想办法解决记者站采访的交通问题。当我在北京参加全国记者会议时，听说报社有一台幸福牌双轮摩托车闲置未用，经实地考察，发现该摩托车基本上是好的。我请示领导同意后很快将摩托车调运到武汉，经过一番维修，这台摩托车成为了记者站唯一可用的交通工具。

活跃的记者采访生活

湖北记者站在开始较长一段时间内仅有我一名记者。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我严格要求自己，按照报社要求发扬主动精神，深入采访，捕捉新闻线索，努力为报社提供可供参考和采用的好稿子。

当时，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都在按照中央的指示召开理论讨论会、工作会、务

虚会以及有关的经验交流会，我都争取参加学习采访。在省委召开的理论讨论会上，有10个单位交流了经验，如华中工学院的“解放思想，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尽快培养人才”，武汉市的“开展群众运动，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武汉钢铁公司的“加强企业管理，大力开展职工技术培训，发展生产”等。

随后，我参加了武汉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教育部重点高校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主要研究教育规划及教育工作中的问题。接着，我又先后参加了武汉医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以及全省各地教育局局长会议，会议重点讨论如何办学、早出人才、快出人才问题。

在武汉市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我采访到会议围绕“解放思想，放宽政策，积极改革，搞活经济”这个主题，提出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清除“左”的流毒和影响，搞活市场调节，促进经济联合和扩大企业自主权。会议对贯彻中央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1979年1月8日至19日，肖志华（一排右五）在北京参加《光明日报》全国各地记者站记者会议留影

在武汉市，我还有计划、有重点地到基层单位，如华师一附中、十五中、保安街小学等学校，采访他们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搞好教学的经验。

此外，根据掌握的线索，我还到宜昌、十堰、黄石、汉川、广济（今武穴）等地进行采访。如在宜昌市采访科技工作情况，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听取意见；在黄石市采访环保局做好环保工作的经验和面临的问题；在广济县采访生物防治的经验，并到该县做得好的红旗大队参观座谈。

每次采访后，我都认真地进行分析整理，选出可用的报道线索，及时给报社写稿，基本上达到一个月或两个月一篇的要求，供报社选用。

在做好正面报道的同时，我还积极而慎重地编写“内参”，为报社和上级领导了解情况作参考。1979年年末，我和《湖北日报》记者程度同志到华中师范学院采访，了解到学校知识分子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实的情况，认为有必要将此种情况向报社反映，于是我们共同写了一份“内参”寄送到报社。可能是这份“内参”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批示湖北省有关主管部门负责办理。后来我了解到，在省委高校主管部门的重视主持下，华师知识分子政策落实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事实证明，写好“内参”，同样是记者应尽的职责之一。

选调青年记者充实记者站

湖北记者站按编制可配备记者2名。我按照报社指示，认真地选调青年记者。经同有关方面联系推荐，考察了解，最后报社批准，决定调武汉大学毕业留校的工农兵大学生陈天生到记者站工作。

陈天生，男，1954年生，湖北蒲圻县（今赤壁市）人，中共党员，曾在家乡较长时间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此人为人正派，聪明能干，有较好的文学工作素养，是名年轻有为的好干部。

陈天生到记者站后，对我比较尊重，我们合作共事，关系相处得较好。他工作积极，很快便作出了成绩。

1980年5月，我因工作需要离开《光明日报》湖北记者站，调回武汉市，到武汉市政协负责文史资料工作。我走后，陈天生一个人坚持记者站工作。再后来，不知什么时候，陈天生也离开了记者站，下海经商，据说成了民营企业某科技发展公司的老板。

陈天生走后，又不知何时，报社同时调来年轻的女记者樊云芳及其丈夫丁某二人到湖北记者站工作。樊云芳夫妻同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专业人才，他们 also 把湖北记者站的工作开展得很好。

（肖志华：湖北省政协文史研究会原副会长，武汉市政协原文史委员会副主任，《武汉文史资料》原主编、编审）

民族一家亲 温暖学子心

——东湖中学代理家长志愿服务活动回顾

◇ 杨万军（口述） 刘中燕（整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武汉东湖中学，就有这么一群小小“石榴籽”，他们是从天山南北、大漠绿洲来到武汉求学的少数民族中学生。

武汉市东湖中学自2011年开办新疆内高班，至今已走过10年历程。办班之初招收的学生均是民考民（一项针对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考生的特殊政策，指符合条件的少数民族考生在中高考时使用本民族语言的试卷参加考试招生录取）类型的学生。他们到武汉之后，面临着四大难关：一是语言不通关，这些学生到东湖中学学习之前几乎都不会讲汉语，交流存在障碍。二是亲情缺失关，学生们到武汉时都只有十四五岁，绝大多数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和亲人，不免想家。三是生活不适关，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南疆，距离武汉3500多公里，

两地气候完全不一样，他们的饮食习惯跟内地也不一样，初来乍到，常常水土不服。四是学习压力关，虽然他们在当地是学校的尖子生，学习成绩数一数二，但到内地后，由于教育水平的差异以及教学语言环境的不同，他们的学习也面临不小的压力，有很多学生存在很大的失落感。如果没有有效的关爱和帮助，一些孩子在面临这些困难关口时，有的会接连生病，有的会萌生退学的想法。这也是每个开办新疆内高班学校在办班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

润物无声桃李香

孩子们遇到了难关，学校的领导和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最开始，学校通过召开新疆内高班学生大会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也通过日常的班级管理自发地给予关心和关怀，提供帮助。

每逢节假日，学校领导和老师更会给予他们细心的陪护、慰问，这些措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为建立更稳固的长效机制，增加帮扶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学校从2012年起，正式推行代理家长工作。从2012年到2015年，主要由学校党总支组织学校党员干部和任教新疆内高班的班主任、科任老师与部分新疆内高班学生结对，每个党员干部或班主任、科任老师担任一到两个新疆内高班孩子的代理家长，进行一对一的帮扶，全程参与新疆内高班孩子的教育成长过程。第一批共有79名学校党员干部和任课老师与138名学生结对。

学校对代理家长的工作内容也做了规范，主要关注六个方面的情况：1. 了解每一个结对学生的基本情况，主要包括家庭情况，生活情况，目前的学习、生活状况等，形成成长档案记录。2. 跟踪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每半个月至少与学生谈心一次，每个月至少一次主动走进学生宿舍，了解学生的生活起居情况，经常与班主任沟通，及时开展学生的思想工作，并做好详细记录。3. 协助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力争让每一个学生在毕业前达到普通话二级乙等水平。4. 及时协助处理结对学生突发事件，比如生病、违纪等。生病的时候要及时看望，给予关心和照顾；违纪的时候要配合学校做好教育转化工作。5. 配合学校安排好新疆学生的节假日活动，比如“新春访汉家”、欢庆古尔邦节等活动。6. 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提供力所能及的学习辅导，参加学校或者班级召开的家长会，做好学习管理和指导。

结对之后，这些代理家长们就成了新疆班孩子的至亲团。巴丽江是东湖中学首届新疆班学生中的一员，也是首批结对的学

生，我有幸成为她的代理家长。进校不到一个月她就接连晕倒，每次都要紧急送到医院救治。经请示，上级部门建议学校将她送回新疆治疗。巴丽江的爸爸来接她回去的时候，巴丽江对她的爸爸用哈萨克语说了一句话，然后她爸爸就不吱声，还流下了泪水。我敏锐地察觉到这个细节，马上让内派老师翻译给我听。原来巴丽江的哥哥出了车祸，住院花了不少钱，她非常担忧，再加上换了新环境，以致情绪紧张、心理失常，癔症频繁发作。如果现在爸爸把她领回去，她很可能就会失学了，不仅如此，她也很可能会跟村里其他没有读书的女孩子一样早早嫁人，她的人生之路将会转个大大的弯。我经过再三权衡，跟学校领导商量以后，决定为了民族的团结和共同进步，一个都不能少，让巴丽江留下！同时，我一方面收集新疆班学子积极进取的事例，对她进行心理疏导，帮助她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另一方面坚持晚自习后陪巴丽江到操场慢跑，缓解心理压力。日复一日，我终于成功地帮助巴丽江克服了心理上的障碍，她再也没有犯过癔症。四年之后，巴丽江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并且选择了师范专业，她说她也要做一名老师，把这样一份爱传递下去。

2013年，阿依加玛力因为下肢肿胀不能行走到医院检查，由于不能确诊，仅同济一家医院我们就跑了七个科室找专家会诊。腿部的剧烈疼痛让阿依加玛力只能一步一步向前挪动，看着孩子痛苦的表情，她的代理家长何卫星老师弯下腰把孩子背在背上，一步，又一步。这个走得再艰难也没有掉一滴眼泪的倔强姑娘伏在何老师肩上的那一刻，眼泪簌簌而下。她说：“我一米七几，一百三四十斤，别人根本背不动。那天趴在何老师背上，我觉得他好高大，像我爸爸一

样!”经过漫长求医问药的过程,孩子终于康复出院。后来,阿依加玛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青岛大学。

这些结对的老师们365天里24小时全天候待命工作,默默地守候这群远道而来的孩子,教说普通话,带着逛江城,病床前陪伴,心烦时开导,过年接回家……他们用自己的爱心滋养孩子们的心田。

爱心浪花一朵朵

2015年,结对的第一届学生毕业了,69名学生全部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孩子们取得的成绩让我们欢欣鼓舞,我们决定把代理家长工作坚持下去。秋季开学,学校总结前一阶段的成功经验,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在之前的结对帮扶工作中,我们发现,新疆班孩子渴望了解内地,了解内地的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和中华文化认同感;同时,内地人对新疆、对新疆各少数民族缺乏认识,也需要加深了解。因此,我们觉得代理家长工作还需要深入到家庭层面。

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有两个创新:其一,在内容上增加了一项,即要求代理家长们可以开展家庭之间的互访交流,代理家长要与新疆班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家人保持经常联系,加强相互了解和交流,在条件成熟和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开展双方的家庭互访,新疆班孩子的父母或者家人来武汉可以到武汉的代理家长家里做客,武汉的代理家长可以在暑假跟随新疆班孩子一起到新疆孩子的家里家访做客。其二,在代理家长的人选范围上走出校门,面向社会征集社区居民参加,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学校民族和谐教育中来。此想法得到了武昌区教育局、水果湖街徐东路社区和湖北知音传媒集

团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当年就征集到6位“社区家长”,2018年又征集到4位,共有10位“社区家长”,她们当着19名新疆班学生的“武汉爸爸妈妈”。

时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李述永同志是10位“社区家长”之一。李部长做东湖中学新疆班代理家长也是出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一次,市里组织志愿服务现场经验交流会,东湖中学参会介绍了学校开展代理家长志愿服务活动的经验,引起了李部长的高度关注,会后她找到学校参会的领导,当场表示要做东湖中学新疆班学生的代理家长。学校就安排了麦尔哈巴跟她结对。虽然李妈妈平时工作很忙,但她总是想办法在周末抽出时间到学校来看望她的女儿麦尔哈巴,有时候是买些水果,有时候送一些学习用品。有一次她来看望麦尔哈巴时,发现麦尔哈巴的头发长长了,总是用一根橡皮筋缠着马尾辫。她想女孩子都是爱美的吧,要是用几个漂亮的发卡别着头发肯定会更好看。于是她就去市场上挑选了几样漂亮的发卡送来了。看着别致的发卡,麦尔哈巴流下了幸福的泪水。李妈妈不仅在生活上关心麦尔哈巴的成长,她还发现,麦尔哈巴来自比较偏僻的牧区,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很少,于是她利用自己参加一些文化活动的时机,经常带麦尔哈巴到外面的世界看看。她带麦尔哈巴到大学里去听讲座、参观社区、参与文化展览等,开阔了她的眼界,也加强了她对内地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提高了她的交流能力。麦尔哈巴说李妈妈给了她很多很多,是她最亲的亲人。

顾瑩是学校新疆班的一名任课老师,也是阿瓦古丽同学的代理家长。听说阿瓦古丽同学家里比较困难,有可能休学,放暑假后,顾老师就到阿瓦古丽同学在吐鲁番的老

家进行了家访。尽管心里早有准备，但家访所见还是让顾老师震惊了。7月的吐鲁番，地表温度已经七八十度，一个胡子花白的维吾尔族老人躺在屋外阴凉处一张破旧的木床上，他的身后是一间破败颓圯的土坯房。顾老师的心情沉甸甸的。这次来阿瓦古丽家里家访，目的就想跟家长做工作，让孩子继续去学校读书。顾老师从交谈中了解到：自从爷爷病重后，照顾家里10亩西瓜地的人手就不足了，阿瓦古丽这次回来，家里已经和她商量好今后就留下来种地了。孩子来到东湖中学就是我们的责任，要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证一个都不能少！这是新疆班团队上上下下共同的誓言，绝不能让孩子因为贫困失学。顾老师和一起家访的老师们纷纷慷慨解囊，学校领导当即承诺按政策每个月给阿瓦古丽一定的生活补贴，帮助她在武汉完成高中学业。阿瓦古丽的父母看到这一幕流泪了，“谢谢你们！有这样好的老师，孩子交给你们我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再苦再难，8月底我一定送孩子去武汉读书！”在学校师生的帮助下，阿瓦古丽最终顺利完成了学业。这次家访，让顾老师也深受触动。放假前，他刚在医院检查出重度2型糖尿病，医生强烈建议注意休息减少工作，他本来打算这次送学生回家后直接向领导说明病情，请求不再带新疆班，但阿瓦古丽的遭遇让他意识到：只要我们献出一点爱，就有可能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在回去的路上，顾老师悄悄地把病假条撕碎了。

代理家长走进社区不仅让新疆班学生融入社区，了解武汉，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认同，同时也让社区群众了解了新疆，了解了我国的民族政策，真正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已经毕业的新疆班孩子都感言，武汉给予他们的太多太多，他们在

武汉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武汉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我们都是武汉人”是他们骄傲的口头禅。

涓涓细流汇成河

随着代理家长活动的深入推进，活动的效果越来越好，在孩子们中间大受欢迎，但却面临着代理家长资源不足的困难。2018年全市两会期间，市政协委员侯伯云提出了《关于让每个来武汉学习的西藏孩子、新疆孩子在武汉有一个“家”的建议》，将开展代理家长活动的需求在市级层面提出。侯伯云委员的提议得到了市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的高度关注。5月，市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联合市政协委员工作委员会，与市教育局、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工商联等6家单位共同发起倡议，在全市范围内发动各界爱心人士参与结亲结对代理家长活动。倡议得到了广泛的响应，经过层层把关，市政协推荐了39名全市各条战线的优秀模范人物担任学校新疆班学生的代理家长，其中，有的是全国道德模范，有的是全国劳动模范，有的是优秀市政协委员……这让我们既感动也深受鼓舞。

全国道德模范吴天祥是艾孜海尔同学的代理家长。艾孜海尔同学刚来东湖中学的时候跟新疆班的其他孩子一样，很不适应内地的生活，不仅是气候和环境的不同，还有吃米饭的饮食习惯让他的胃也很不适应。另外，由于他一直没有离开过父母，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差，自己不会洗衣服、套被套，学习上也有一些困难。艾孜海尔原来在新疆当地学校是佼佼者，但到汉后跟其他优秀的新疆班孩子在一起就不再有那么大的优势了，

因此他的心理落差很大，一度产生了畏难退缩的情绪。几经班主任和学校领导的思想教育和劝导，他还是整天愁眉苦脸，不愿意和他人交流，坚持要回新疆，他的爸爸到学校做了三天工作也未能见效。学校经过考虑决定安排吴天祥做他的代理家长。在吴天祥和他的第一次谈话后，艾孜海尔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后来他说他是被吴天祥爷爷的榜样力量打动了，这么高龄的一位老人还在想着奉献社会，那该克服多大的困难，得有多大的爱心才能做到啊，相比吴天祥爷爷所做的一切，自己碰到的困难简直不值一提。慢慢地，在吴天祥的鼓励和关怀下，艾孜海尔克服了种种不适应，不仅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而且学习也突飞猛进，在期末考试中进入年级前列，并且插班到本地班学习，又找到了当年的自信和进取的劲头。

经市政协民宗委推荐，市政协委员李春生成为了艾比布拉同学的代理家长。李爸爸十分注重对艾比的陪伴，每到节假日，李爸爸就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把艾比接回家，不仅让他感受亲情，还带他开阔眼界。在陪伴的过程中，李爸爸和艾比经常拉家常，关心他的学习、生活和家庭情况，艾比也打开心扉，主动讲述学校的趣闻、同学之间的点点滴滴。通过这样和风细雨式的陪伴，这位代理爸爸已然是小艾比在异乡武汉的至亲家人，艾比渐渐从心底里爱上了这座城市，武汉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加入，让代理家长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少爱心人士纷纷打来电话或者上门来表达想成为代理家长的愿望和请求。截至目前，我校新疆班代理家长工作共经历了9批（每年新生都结对一次，9年结对9批），有107名学校教师和82名社会爱心人士参与结对，帮扶了

379名新疆班孩子，有近一半的新疆班孩子接受了代理家长的帮扶。在代理家长们的倾心关怀、倾力帮助之下，我校的新疆班学生没有一个辍学流失，每个同学都在努力实现自己的大学梦，我校的民族教育工作也取得优异成绩，受到上级部门、社会各界和新疆班学生及其家长的一致好评。学校代理家长工作多次受到教育部、新疆教育厅等主管部门在全国会议上的表扬，国家民委、中央新疆办、教育部民教司等上级部门多次来学校调研新疆班工作。学校先后荣获武昌区“最美教育团队”、武汉市民族团结示范先进单位、湖北省“民族文化进校园”十佳单位、2018年第六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等荣誉称号。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对人才的培养，不仅要教授书本知识，还要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少年时期正是三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新疆班的孩子远离家乡、远离父母，有代理家长给予关怀，弥补亲情的缺失，能促进孩子们人格的健康发展，为祖国培养高素质的接班人。结对互动的过程也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体现，培养了各民族之间的深厚情谊，这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杨万军：武汉市东湖中学副校长；
刘中燕：武汉市政协民族宗教工作处四级调研员）

老照片中的汉口英租界岗亭考析

◇ 胡全志

近十年来，一批批清末至民国时期的老汉口历史照片、明信片源源不断从国内外收藏者手中现身互联网，吸引了武汉民间文史研究者的注意。不少民间文史研究者通过对照照片的分析研究，佐以地图、档案、方志等文献资料，考析到其中部分历史照片的年代与场景，获取了诸多发现。目前部分历史照片的破解，填补了现有史料及著述（涉及方志、地名、里份、街道、建筑等）的不足，有的还起到了勘误的作用，由此深化了武汉近代城市史的整理研究。本文试图利用现有历史照片的分析研究，还原一段汉口英租界岗亭设立的未详历史，以供相关人员作进一步研究。

从一张标志物为六角岗亭的老照片考证其所在地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网站上开放了一批中国历史照片，其中标注为汉口的照片引

起了武汉民间文史爱好者的极大兴趣，但由于年代久远，世事更迭，很多照片难以找到并确认当年拍摄的具体地点，也未知拍摄年代，形成悬案。

2017年，民间学者田联申在汉网“人文武汉”栏目发帖，探讨一张民国时期汉口租界地区义勇队队员在街头活动的照片（图一），而这张照片的关注点是一座砖混结构的西式岗亭。这张照片摄于哪一年？拍摄地是租界哪个地方？义勇队是哪个租界的？路边那座岗亭是何人所建？在网上引来不少民间学者的围观与讨论。

可以确认的是，图中义勇队队员的着装是英式的，因此为英租界义勇队队员，照片的来源地也是英国。另外，武汉籍旅英学者、收藏家范榕先生表示，他从英国人手中收藏到了包括这张照片在内的一组同时期原始照片。

那么，这张照片究竟是在哪里拍摄的呢？从英租界义勇队这一线索，可以基本



图一：汉口英租界义勇队队员与岗亭。此照片被考证摄于1916年

锁定应该是在英租界区域，综合道路和建筑特征判断，与中山大道相吻合。民间学者孙庆力判断照片拍摄地可能在今中山大道大智路一带，但当时还没有找到具体的论证依据。

要辨认出这张照片的具体位置，确实需要花费一番功夫。从照片中的路形来看，在中山大道无疑，但从两边建筑物来看，根本无法判断出具体位置。最可靠的办法还是从照片中的文字信息入手顺藤摸瓜，查找线索。而我较为擅长的就是通过辨认照片中的文字信息查找出地址。

这张照片中左边有中式建筑，判断是租界区华界地带，右边是西式建筑，可能是租界区。由于手头照片清晰度不高，上面的文字辨认不清，于是我请持有原版照片的范榕先生将照片局部放大，部分文字达到可以辨认的程度。左边二层楼茶楼模样的中式建筑的招牌、广告文字有疑似“大观第一楼”的招牌，“观”字的字形略似繁体“觀”字，“楼”字也是用的繁体字手书

“廋”。廋，屋中窗牖通明的样子。

《说文解字·广部》载：“廋，屋丽廋也。”清·段玉裁注：“谓在屋在墙窗牖穿通之貌。”

另外，还有“张春元理发”“顺昌兑换银洋”“顺昌纸烟批发”等零星吊牌。透过这些信息，查找商号地址一无所获。右边有一家店铺，招牌上分别

有中、英文，店名为“茂兴号”，其中“茂”字有缺损，颇难辨认。其他招牌、广告文字为“……号自造（选）铁床藤椅五金玻璃照□洋货□□”“本号精造西式木器铁床藤椅批发”“自造（选）五金洋货各色……”等。通过查找“茂兴号”，得出的结论是一家木器店，1920年版《汉口商号名录》中记载的地址是“俄租界义品里”。如果只是找到这一家，还是孤证，最好能找到相邻的旁证。于是，我请范榕先生再次把照片中右首第五个门面有三个大字的店名放大，认出是“公泰质”三个字，还有一广告牌“兑换银洋”。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突破口。

“公泰”是这家商号的名称，“质”是抵押之意，也就是典当行的意思。在商号名录中查找到名为“公泰”的典当行地址在“俄租界义品里”。由此，解开了这张照片方位处所的第一个“绳结”，“茂兴号”和“公泰质”都是同一里份建筑义品里的临街门面，照片中义勇队队员和岗亭的大致位置就基本可以定位了。《武汉地名志》（1990

年)载:“位于江岸区合作路与兰陵路之间。南通合作路,东北至兰陵路,中段西侧有过街楼通中山大道。20年代由比商义品银行建房成里。称义品里。”

照片中还有几个疑问,最右边的房屋旁边似乎是一条路口,这是什么路呢?我注意到,照片前景地面上有大面积阴影,说明在这个路口相邻处有一个高大建筑,是什么建筑?照片左边也似乎有一条路,但既不是中山大道,又不是大智路,究竟是哪条路?左边华界的店铺为什么没有在《汉口商号名录》中出现?

既然找出了义品里,其他问题自然也会迎刃而解。与这张照片同期拍摄的还有一张照片,是5名英租界义勇队队员坐在一个伞形岗哨点的合影。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到,“茂兴号”处于街角处,正前方是中山大道,那么,紧邻的那条路当然就是合作路了。

这张全景照片前景处大面积的阴影,民间学者孙庆力找到合理的推断,那是合作路路口四层楼的汉口电话局投影。仔细观察这一建筑物投影,发现投影并不规则,似乎正在建设中,尚未完工。《武汉市志·交通邮电志》(1998年)中有记载:“1916年1月18日,交通部与中日实业有限公司订立汉口、武昌两处共电式电话交换机装置合同,并在汉口合作路口兴建新式四层楼电话大厦,1917年5月12日汉口电话局迁入新址,定名为武汉

电话局。”《武汉大事记》记载:“1917年5月12日,汉协盛营造厂承建的汉口合作路电话大厦竣工,汉口电话局迁入;同年兴工建造天津路电报大厦,1919年建成,汉口电报局迁入。二局毗连,1946年2月合并成立武汉电信局。”另,2017年武汉市文化局主编、武汉出版社出版的《武汉中山大道》一书中《汉口电话局的前世今生》介绍:“1915年,交通部在中山大道合作路口建新式电话大楼,改装新机。1917年5月,汉口电话局迁入新址,定名为武汉电话局。”

综合以上资料,电话局有可能是“建于”1915年而不是1915年“建成”。从照片的投影上看,合作路路口的电话局大楼已经在修建,那么,此照片的拍摄年代应不早于1915年,极可能是1916年。合作路旧称吉祥路,又称界限路,介于英租界和俄租界之间,1927年英租界收回后更名为合作路。

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民国时期地图上可见,今中山大道大智路至合作路



图二:民国时期湖北省汉口电话局明信片,图上有义品里、岗亭、“茂兴号”以及“公泰质”等关键地理标识要素

路口一侧地形已发生较大变化，合作路路口对面的地方，曾经有一个“大同里”，从中山大道斜向通往大智路，《武汉地名志》中未录“大同里”词条，但在“历史地名”中查到1940年前叫大同里，40年代由贺衡夫重新建房，改名怡隆里。1918年《汉口市街全图》中，大同里所在地为“官钱局地”。1919年地图中已出现大同里，当时的合作路叫吉祥路。1922年《武汉三镇街市图》和1930年《武汉三镇市街实测详图》中分别标有“大同里”。范榕先生提供的20年代地图上有“大同里”，1931年特三区地图中标有大同里路形。1938年出版的《汉口市街道详图》《最新汉口市街详图》中均有“大同里”。1947年《武汉地区城市分区图》、1949年《最新汉口市街详图（样图）》和1951年《武汉市汉口区马路图》中，“大同里”还存在地图上。《汉口指南》（1920年）“本埠地名检查表”中注有“大同里”的方位：“大智门马路下首。”照片中砖混结构的岗亭和“大观第一楼”的所在位置，就在原大同里湖北街（中山大道）入口处。这一带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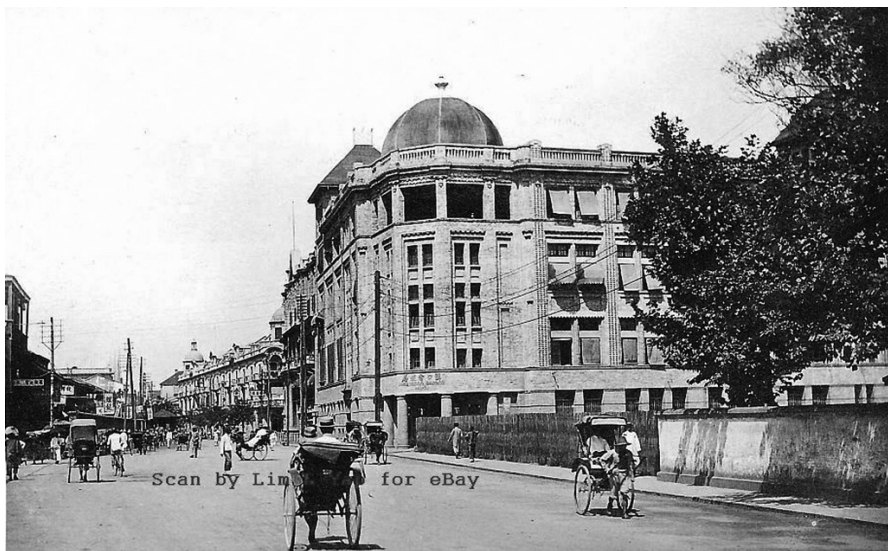
屋大约在1920年前发生改变，故1920年出版的《汉口商号名录中》没有录入其商号。

合作路路口英式岗亭照片的时间探析

2020年3月，我偶然发现一张民国时期“伊势屋发行”的“湖北省汉口电话局”填色明信片（图二），这张明信片为本文开篇所提到的那张照片提供了准确的方位佐证。

汉口英租界义勇队队员与岗亭的黑白照片是从中山大道上首往下首方向拍摄的，而这张明信片照片的拍摄角度正相反。照片的右边是华界，有一岗亭，岗亭的前面是一栋中式二层楼，那里也是大同里往大智路的方向。正前方是中山大道。左边四层楼建筑是汉口电话局大楼，大楼脚下是合作路路口，紧邻合作路路口的这排二层楼西式房屋，就是义品里临街门面房的一部分。第一家白色门面就是“茂兴号”，占有三个门面，第二家绛色门面就是“公泰质”。这张照片的拍摄年代可以通过电话局和电报局大楼建成时间来认定。

《江岸区志》（2009年）记载：汉口电话局大楼于1915年建成（可能有误，应是1916年建成）；《武汉市志·交通邮电志》记载：电话局1917年迁入。而这张照片上，位于天津路路口的汉口电报局大楼还没开建，此大楼于1919年完工。据《武汉市志·交通邮电志》载：“1920



图三：位于中山大道天津路和大智路口的汉口电报局大楼，此时右边的智民里尚未兴建，远处可见岗亭

年，汉口电报局迁至新建的天津路电报大厦。”由此推测，这张照片应当是在1916年至1919年期间拍摄的。照片证明，这座岗亭在1916年就已经存在了，它的实际建造年代应该早于1916年。

但是，另外有学者分析认为，合作路路口英租界义勇队照片的历史背景应该与

1925年6月发生的汉口“六一一惨案”有关。那么，合作路路口英租界义勇队这张照片究竟拍摄于哪个年代呢？

位于中山大道天津路和大智路路口的汉口电报局大楼建成后，成为汉口一大街景，先后被拍摄并制作成明信片发行。其中有一张明信片以电报局大楼为主体，楼顶有一半圆穹顶（图三）。通过仔细观察并分析可以看出，大楼右侧天津路旁的智民里尚未兴建，临中山大道是一片围墙，围墙里长着一棵参天大树。明信片正前方远景处隐约可见那座不起眼的英式岗亭。这张明信片中有多个节点值得关注：一是电报局大楼已经修建并开始办公，楼上窗户装有窗帘；二是义品里已经改建成三层楼；三是道路左边有一道英租界当局修建的华界和租界分隔围墙，大智路路口可见当时的迎宾旅馆侧影；四是天津路和北京路之间的智民里还没有动工修建，这一带围有院墙。智民里在1913年前后称“风池里”，有些地图上又写作“风迟里”，名称稍嫌混乱。《汉口指南》作：“风墀里 英界湖南街后。”这张以电报局大楼



图四：汉口大智门通路电报局及电话局，右边的智民里临街三层楼建筑已兴建

为主体的明信片拍摄时间范围大约在1920年至1925年间。因为在1925年“六一一惨案”中，愤怒的市民将此地英国人修筑的租界围墙给拆除了。另外，智民里也是20年代中期修建的，据《武汉地名志》载：“位于江岸区北京路与天津路之间。清末成里，称风迟里。20年代中期，智民营造厂老板袁瑞泰在此兴建新型楼房住宅，统称智民里，风迟里之称自此消失。”另据资料，1911年此地建有“新民茶园”，也是汉口知名的老戏园，民国地图中有标注。这张明信片中的义品里已经改成三层楼了，所以英租界义勇队队员那张照片就不可能是1925年拍摄的。

另外，民国时期还发行过一套“汉口名胜”的彩色明信片，其中街景标注为“湖北省汉口大智门通路电报局及电话局”（图四），与前一张明信片拍摄角度一致。这张明信片中，主体仍是坐落在天津路路口的电报局大楼，右边的智民里临街三层楼建筑已兴建。1949年后这栋楼曾为武汉市化工原料批发公司所在地，一楼原是化工原料市场，今不存。这张主体为电报局大楼的彩色



图五：1925年“六一一惨案”中中山大道黄石路至大智路一带的围墙被拆毁，义品里房屋此时已由二层楼改建为三层楼

明信片的拍摄时间可基本锁定为1925年至1931年间。天津路右边已经建有三层楼房，说明智民里已经成型。此里中有一栋有名的房子叫“怡庐”，为近代实业家贺衡夫房产之一，民国地图上也有标注。明信片左边大智路一侧电线杆旁露出三层楼迎宾旅馆的一角，而迎宾旅馆在1931年汉口水灾时被淹垮塌，有多张历史照片为证，而大智路拐角这一带重新修建的二层楼建筑大约建于30年代后期。在这张明信片里，也能看见远处的岗亭。

最说明时间关系的还有一张照片。照片显示的画面是：1925年“六一一惨案”中中山大道黄石路至大智路一带围墙被拆毁的实况，地上散落着砖块和铁栅栏，还有被捣毁的“太平洋肥皂”广告牌等（图五）。照片也是从中山大道上首往下首方向拍摄的，右边是智民里临街三层楼建筑、电报局大楼等，正前方是位于大智路路口的三层楼迎宾旅馆。照片中的关键要素是：义品里房屋此时已由二层楼改建为三层楼。也就是

说，1916年拍摄的英租界义勇队队员和岗亭的照片中，义品里房屋还是二层楼，到1925年时早已改为三层楼了。

通过多幅照片证明，合作路路口英租界义勇队的照片并非拍摄于1925年。根据范榕先生提供的证物，他从英国收购的5张同一批1916年原版照片背面都写有“1916年7月在中国

汉口的革命”的英文手写字，也就是1916年7月30日由革命党人发起的“擒王（占元）”事件。由此判断，英租界义勇队和岗亭的照片拍摄于1916年，这一点也与当时义品里等早期建筑的形态、商号广告风格以及民国初期街上人物衣着等因素综合分析相符。《武汉大事记》载：“1916年7月30日，留汉革命党人聂豫、吕丹书等举行暴动。数百名党人举‘湖北护国军第六师’大旗，以‘擒王（占元）’为口号，攻击警察署、军营、大智门车站、汉口镇守使署等处，因力量不足，遭镇压失败。是役被俘党人100余名，多遭杀害。”当年由于暴动，各国租界出动警察、义勇队在街头要道和租界、边界加强巡逻、戒备，也合乎情理。

汉口南京路路口英式岗亭照片考析

在发现汉口合作路路口英租界义勇队队员值守以及固定岗亭的照片之前，不少学者在汉口老照片中曾经见过另一座同样规

格和样式的岗亭，只是没有将二者的关系联系起来。

这一座岗亭在中山大道南京路路口，原金城银行（今武汉美术馆）前端，具体位置约在今馆前广场喷泉处。1931年汉口水灾的历史照片中，这座岗亭的全貌因为拍摄金城银行被淹时的情景而出现在人们眼前（图六）。

当人们第一次见到这座岗亭照片时，很难辨别出它是抗战前还是抗战时期的遗存。民间学者田联申在观察分析1914年、1916年中山大道江汉路路口中国银行老照片时发现，远景处南京路路口一座三层楼建筑前早已有了这座岗亭。由此，他将南京路路口和当时未知的合作路路口岗亭联系起来，在网上发帖邀学者分析讨论。

1914年外国摄影师拍摄了一组“汉口全景图”照片，其中有一张的画面是中山大道江汉路至南京路一带俯瞰街景。照片是在汉口水塔塔顶拍摄的。照片中，江汉路路口的汉口中国银行尚未兴建起来，沿中山大道（原名湖北街）左侧可见有一排长长的铁栅栏墙，这是当时华界和英租界的分隔线。中山大道向前延伸的尽头处，就是南京路路口，那里有一栋三层楼建筑，这栋建

筑的历史背景尚待查考。1930年建成的金城银行，就是这栋建筑拆除后在原地基上建成的。三层楼房前隐约可见一座六角形岗亭。此时，汉润里的雏形似乎已经形成，《武汉地名志》载：“此里始建于1917年……于1919年竣工。”南京路路口的大孚银行是1936年建成的，此前则是一排三层楼房。

1916年汉口中国银行建成后，又有一张新的明信片面世，照片为汉口中国银行以及英租界湖北路之景，街景尽头处同样可见那座岗亭。

除此之外，目前能见到最早的南京路路口岗亭照片，是一张1911年的照片。画面中，一名外国摄影师手里提着照相机，站在汉口水塔塔顶栏杆边往中山大道方向鸟瞰，他的同伴爬到塔顶钟楼处更高位置，在拍中山大道水塔至南京路一带街景全景时，将他也摄入了镜头。这张照片反映出辛亥革



图六：1931年金城银行门前淹水，照片中无意留下英式岗亭全貌

命爆发后汉口经历战火的情景，中山大道以北的江汉路两侧民房变为一片废墟。放大照片，中山大道南京路路口三层楼建筑和岗亭清晰可见，右边汉润里此时只有一座平房。

目前发现的位于南京路路口岗亭的照片分别有1911年、1914年、1916年各1张，1931年2张，共5张。位于合作路路口的岗亭照片分别有1916年至1931年的共4张。这两座岗亭从建筑样式上看，是同一种设计，呈六边形，坡瓦，岗亭门均朝向中山大道上首，为西南朝向，另五面开有瞭望窗。两座岗亭雨水排水管设计都一模一样。目测岗亭直径3米多，高度约4米，是典型的英式建筑。类似的岗亭不仅在汉口出现过，在租界时期的上海外滩老照片中也不鲜见。

那么，为什么这两座岗亭会分别出现在合作路和南京路呢？

1898年8月，英租界在汉扩界，与清政府正式签订《英国汉口新增租界条款》。扩界后，英国租界东南至长江边，西南从江汉关至今后花楼街南口，东北至合作路，西北至中山大道。合作路自此就成为华界、俄界和英界的重要冲。当时，英租界的西界扩展到距汉口城墙5丈处，留下5丈地作为公路，归中国政府管理。但英租界当局在自华界进入这条公路的各个街口安设铁门，任意开启、关闭，使这条沿街的中国公路成为附属租界的地段。南京路路口也是英国人十分看重的另一个要冲。

据史料记载，英租界当局还在华界通往英租界南界的三个街口设置铁门，随意开闭，将歆生路（江汉路）以及与其相连、位于英租界旧有界址以南的太平街都圈入租界范围。1907年汉口城墙拆除后，英租界当局在租界两侧筑砖砌铁栅围墙，有一段越界伸到后城马路处（今中山大道）。在今大

智路处开一较大通道，其余如今保成路、南京路、汇通路、黄石路，虽先后拆有缺口，然非正式通衢。在黄石路缺口筑有铁门。所有这些缺口，英租界当局均随意封闭，行人极感不便。因为这道围墙，中国政府实际上丧失了对这段中山大道的控制权。最后经交涉，由中国官厅拆除了这道围墙，并将墙边一段零落不齐的街命名为保华街，以示保卫中华领土之意。

从目前所发现的汉口老照片中，可以见到一些英租界区设置的栅栏、沙袋堡垒、街头木制小岗亭、撑有雨阳伞的哨所等军警设施，而这种体量较大、砖混结构的固定式岗亭，仅见两座，现有武汉史料及相关研究著述中未见记录。

这两座西式岗亭，有可能是武汉市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岗亭建筑。关于中山大道两座岗亭的建造年代，可作如此推理：应当是汉口城墙拆除后建造的，因为原有的城墙本身就是天然界限，修建湖北街后才有设置岗亭的必要。1927年收回英租界后，岗亭的作用自然消失。1931年后，岗亭逐渐退出人们的视线。关于它们的确切建造、消失年代及使用情况，期待武汉文史研究者有进一步的发现与研究。

（胡全志：武汉市政府参事，武汉技师学院退休教师）

义品里及其周边历史建筑

◇ 王汗吾

外商里份义品里

中山大道的合作路至临近黄兴路段，俄租界时名为亚历山德罗夫街，俄租界收回后改名五族街，1943年改名中山东路，抗战胜利后合称中山大道。在合作路至兰陵路之间，临街的房屋看似朴实无华，连同后面的义品里，却是汉口大名鼎鼎的房地产经纪公司——比利时义品地产公司投资建造的。

义品公司原名比商义品放款银行，1911年3月3日在汉成立，经营房地产抵押、房地产经租、买卖、建筑等业务。1919年开始办理“挂旗经租”业务。义品公司贷放抵押借款，由于很多借款人到期不能偿还，以所抵押房地产抵偿，因而取得大量房地产。在经租方面，按照租金扣取15%~20%的佣金。

义品放款银行原址在蔡锷路，曾作为比利时驻汉口领事馆（现在是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在一张辛亥革命期间的老照片上，黎元洪从比利时驻汉口领事馆走出来，后面有一块长方匾，写着“义品放款银行”，还有一块长条匾，写着“大比国钦命驻扎汉口管理通商事务领事衙门”。因为1861年汉口对外开埠通商时，清政府要求凡是来通商的国家，一定要有领事官员来管理自己的商人。有些国家的领事馆人数不多，就在来汉经营的公司里租几间房办公，甚至有的公司老板兼任驻汉领事。

20世纪20年代初，义品放款银行在俄租界西南部投资建设了义品里。临街是三层楼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商铺，两端转角的楼顶建有穹顶，后面是10栋二层石库门楼房。抗日战争武汉沦陷后，义品里曾被日本海军作为慰安所。

据解放后的资料显示,1953年,义品公司在汉口自有房屋、土地的年租金收入3300万元。此外,代理经租4家外侨的房屋140栋和华人产业16起(里弄房屋158栋),共计经租房屋298栋、土地13484方丈(合148324平方米)。1955年10月6日,武汉市房地产公司与义品公司签订承让财产契约,并承担义品公司在汉的债务。

义品里中山大道过街楼口,有著名汉派服装店白海记和铁鸟照相馆,对面有中华老字号五芳斋餐馆。旁边的五金公司大楼,其前身是世界大戏院。

教会名校圣罗以

义品里南面出口在合作路,旧称吉祥路,又称界限路,是英租界与俄租界的分界

线,1927年改称合作路。与义品里紧紧相邻的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教会学校——圣罗以女子学校。

据该校校史记载,1909年,美国人顾美玉(女,1869~1934年)为纪念美国著名圣公会传教士Lois,在宝善里附近开办圣罗以学校。1912年,美国人柯雅丽(女,1857~1935年)在校内开办圣罗以女子师范学校。次年,美国人赫丽德(女,1869~1929年)在校内增设圣斐比女子修道院,三校并立,均由美国圣公会管理。1917年,顾氏、柯氏因故离校后,三校校务均由赫氏主持,并添办圣斐比妇女学校,后增设初中部。1927年春,在反教会学校风潮中,三校停办。1928年,圣公会又举办圣罗以女子初中补习学校,聘刘媛珍为校长。1929年,学校改组为圣罗以女子初中暨附小,由黄馥亭博士接办,并成立以陈志西为董事长的校董事会。

1938年3月10日,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简称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圣罗以女子初中举行成立大会,约有700多名中外来宾、政府官员和各界妇女人士参加会议。会议选举理事55人,推定宋美龄担任理事长,李德全(冯玉祥夫人)任副理事长,常务理事有邓颖超、孟庆树、史良、曹孟君、沈兹九、安娥、张蔼真、陈纪彝、郭秀仪、唐国桢、陈逸云、徐闾瑞、任培道、舒颜昭、黄卓群等人。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学校停办。



20世纪20年代的后城马路义品里街面房

1946年,学校复办。1949年教会撤走后,学校更名为私立圣罗以女子中学。1952年夏,政府接管该校,更名为武汉市第五女子中学。1955年春,命名为武汉市第二十女子中学,1956年以后开始实行男、女生同校,改称武汉市第二十中学。1958年秋招收高中新生,发展为完全中学。

我于1964年考入市二十中初中,分到2班,应于1967年初中毕业,但因为“文革”“停课闹革命”,1968年年底作为知青下乡离校。那时,从合作路大门进去,左边临街是砖混结构的楼房,一楼是图书室、实验室等,二楼有个大礼堂,原来是个教堂。大门右边临街是钢混结构的三层新楼房,即我们初中部分班级所在地。新楼房的北面是砖木结构的三层老楼房(有教室和教研室),再北面有两栋小楼房,是老师住房。正对大门的是操场,操场的北面是健身房或者叫风雨操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老房子基本都被拆了,换成钢筋水泥新建筑,恐怕只有大礼堂所在的大楼被包裹在钢筋水泥之中了。

电话局里迎解放

界限路的英租界一边,据1931年《汉口特三区街道房屋图》标注,有电话局和安孚洋行、和记公司。安孚洋行在武汉史料中没有更多记载。和记公司也未见记载,只是在湖南省岳阳市有关资料中见到:“1920年,……汉口杨芝泉在上鱼巷子开设‘和记’,经销英商德士古洋行幸福牌煤油;汉口商人杨某在下街河口开设‘和记’,经销美商美孚洋行鹰牌煤油。”不知界限路上的“和记公司”与岳阳的“和记”有无关联。至于“和记”与杨姓联系在一起,英商“和

记”洋行的买办杨坤山似乎并没有从事过煤油经销,也可能与界限路上的“和记公司”无关。

作为国内安装市内电话最早的城市之一,电话局在武汉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1902年,汉口电话局成立。现在仍然屹立的电话局钢筋混凝土4层大楼建于1915年,由英商通和有限公司阿特金斯和达拉斯设计,魏清记营造厂建造,是典型的欧式建筑。其立面为变化的三段式结构,保留了古希腊柱式和顶部山花的特征,但整个设计趋向轻盈,与之相应,墙面及檐口女儿墙富有变化。

1917年,汉口电话局改称武汉电话局,1946年改称武汉电信局。1949年5月,武汉电信局的“反搬迁、反破坏”斗争是整个武汉迎接解放的缩影。解放前几天,中共武汉市委(地下)负责人之一刘实,指示在汉口市地方法院担任“实习推事”(审判员)的地下党员王千弓(实际为法院系统与医院系统党支部书记),从法院的“赃物室”里搞出5支枪和一些子弹,送给武汉电信局的工人纠察队。地下党已争取武汉电信局局长尤箕照、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祝秉珩等参加“反搬迁、反破坏”迎接解放的斗争。中共武汉市委(地下)、鄂豫第三地委城工部和襄南地委城工部的地下人员,在这里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把重要设备拆卸下来转移到职工宿舍和外国洋行仓库中,组织武装的工人纠察队“护局应变”,并“软硬兼施”对付前来破坏的敌军:一是派代表同领队的军官到工会福利楼谈判,并准备了丰盛的酒菜“招待”他们;二是筹集了几千银元以收买军官;三是集中工人纠察队,持枪关门固守。最后,电信局完整地保存下来,并成为地下党迎接武汉解放的通信指挥中心,为解放武汉作出了重要贡献。

兰陵路上大剧场

义品里北出口所在的兰陵路，原名列宾街，1925年收回俄租界后改名兰陵路。那个时候，正值直系军阀萧耀南任湖北督军兼湖北省省长。萧耀南1875年出生于湖北黄冈县孔埠镇萧家大湾（今属武汉市新洲区），根据中国传统家谱学说，萧姓郡望为兰陵，今山东枣庄附近（后又有南兰陵——今江苏常州附近，以及河南郡等），时人称萧耀南为萧兰陵，兰陵路之得名似与黄陂路或黎黄陂路（人称黎元洪为黎黄陂）有异曲同工之妙。

兰陵路上还有个兰陵村，1926年《汉口特区全图》在此标注的是“新泰洋行”。《武汉地名志》（武汉出版社，1989年）载：“1936年由华人购回地皮重建房屋，形成里巷，因临兰陵路得名兰陵村。”其中有二层和三层红砖房屋20栋。

兰陵路有个著名的中南剧场。它最初由武汉名人刘玉堂投资，建于1924年。剧场原名环球大戏院、大中华电影院，还叫过光明大戏院、文化会堂等，50年代改名为中南人民艺术剧院、中南剧场。在1959年建起武汉剧院之前，一直是武汉最大、最现代的剧院和电影院，也是各剧种、各剧团重要的演出窗口。全面抗战开始的1937年7月底，光明大戏院上演了表现某抗战将领壮烈殉国的时事京剧《卢沟落日》；9月，上演了表现人民为抗击异族入侵付出巨大牺牲的新编京剧《万里长城》。12月22日到25日，在汉口的全国14个剧团在光明大戏院举行全国戏剧界劳军联合大公演（包括楚剧、汉剧、平剧、话剧），演员阵容盛大，声势浩大。12月31日，中华全国戏

剧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在光明大戏院举行，选出99人为理事，并决定每年10月10日为戏剧节。1944年起改为2月15日。50年代，凡来武汉的苏联、东欧等国家的歌舞团、芭蕾舞团和交响乐团，都在中南剧场举行演出。60年代，武汉歌舞剧团的歌剧《刘三姐》《洪湖赤卫队》等以及武汉儿童艺术剧团的儿童剧也都在这里演出。21世纪初，武汉市政府投资1.5亿元，在京汉大道修建新的中南剧场。新剧场2007年建成，总建筑面积1.46万平方米，内设话剧中型剧场、儿童剧小型剧场等，是中南地区唯一的专业话剧演出场馆，也是第八届中国艺术节主要场馆之一。

（王汗吾：武汉地方志办公室原副巡视员）